

# 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 (1918—1936)

## —— 民國學會個案探討之一 ——

郭 正 昭

- 一、引言
- 二、時代背景與前驅
- 三、組合分化的過程與活動涵蓋的領域
- 四、組織結構的型態與重整反應的思潮
- 五、領袖群的拙樣人物——王光祈的改革思想與過渡性格
- 六、結論

### 一、引 言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的產物，<sup>①</sup> 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半個世紀的動亂歲月使「五四」成了歷史，也使「少年中國學會」成了歷史。從七十年代的立足點迴望「少年中國學會」其人其事，可能得到的是一個歷史的視野和角度，但却非全然客觀。因為生長在七十年代的人所承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直接間接尚難擺脫「五四」的影響，故此時此地探討「少年中國學會」，恐不免滲雜主觀的成分。只是由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文化的間隔與變遷，七十年代的人對「五四」亦自有其歷史的感觸。本文即基於此一感觸，以一個學會為經，以一個人物為緯，交織成一幅歷史圖象，企望為近代史學者描繪一個輪廓，提供研析的初步線索。

以傳統的歷史背景為基礎，再配合上近代西方社會文化變遷的現狀，本文採用

---

① 周策縱在其所著「五四運動史」一書中，曾一再論及「少年中國學會」。本文採用「五四」一詞，亦根據該書廣義界定，泛指民國六年至十年間的中國新文化運動。詳見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6, p. 80, p. 79, pp. 188-189, p. 190, pp. 251-253, pp. 322-323.

「學會」一詞，有相當獨特的界定；其涵義即有別於傳統中國的「黨」、「會」、「社」一類團體，又較現代西方社會文化所接受的高度專業性的「學會」(learned society) 的概念為廣泛。大致說來，本文所謂「學會」，相當於近代西方的「知識會社」(intellectual society)，是指該一時期知識份子所組合的，具有「改革性的」(reformative)，「組織性的」(organizational)，「公開性的」(public) 與「理性化的」(rational) 集會結社的活動而言。換言之，相對於上述界定所指涉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的是近代中國的革命性黨會，秘密會社，以及一切純宗教性的組合，因為它們不具備「改革性」、或「公開性」、或「理性化」的必要條件。此外，衆多散處鄉野的詩社一類鬆漫的團體，其聚會形式與活動旨趣，顯然是傳統農村經濟社會的殘遺，缺乏近代學會基本而積極的「組織性」，故本文均一一將之剔除，只有在論述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時，偶一提及，藉供比較參考而已。

本文側重個案探討，是全面整理近代中國學會史的初步工作。但從單獨個案的孤立研究，最不易追求歷史變遷的真象和線索；「少年中國學會」必須放在近代整個社會文化變遷的持續過程中去觀察，從更遼闊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環境去探測，才能充分顯示其歷史的面貌與意義，正如近代生物學大師達爾文(Charles Darwin) 在一八六一年所說：「我相信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不是因為我能證明任何一個種類變遷到另一個種類的單獨個案(Single Cases,) 而是因為它配合並清楚解釋了分類，胚胎學，形體學，基本器官，地質學上的繼承與分配的一大羣事實。」<sup>②</sup>

從光緒廿一年(1895)強學會成立開始，據作者非正式的一項估計，在國人主導下所組合而符合上述界定的學會，晚清十六年間(1895—1911)，約在六百個以上，<sup>③</sup> 而民國以後的十年間(1912—1821)，亦當超過四百個。此為研討「少年中國學會」歷史背景中的一大羣事實。中國近代學會是社會文化變遷的產物；而學會

<sup>②</sup> 轉引自 *Theories of Society*, ed. by T. Parsons; E. Shils; K. D. Naegle; J. R. Pitts, The Free Press, 1962, Vol. I, xxi.

<sup>③</sup> 參見王爾敏：「清季學會彙表」，大陸雜誌第廿四卷第二、三期。胡懷琛：「上海的學藝團體」，上海通志館期刊第二卷第三期(上海，1934, 12)，頁八二三至九四六。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九〇至一四三，頁一九九至二〇六。

本身的組織結構與思潮取向，在某一層次上又足以代表社會文化的變遷。本文追尋此一變遷的事實痕跡及其演化的理論基礎，乃是基於一種超越個案的觀察，而「少年中國學會」於此所提供的，只是這種超越個案觀察的具體指標之一。

## 二、時代背景與前驅

近代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的狂潮，以席捲之勢向全球蔓延，帶動了難以數計的劇烈改革。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這個狂潮開始以決定性的力量震撼了中世紀沉滯的東方世界，古老的中國首當其衝，而強學會於光緒廿一年成立，便是民族主義思潮沖擊下，中國知識份子集體覺醒的表徵。這個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型態是「外鑠」的；換句話說，其動力乃來自傳統社會的外部，因而導致了消極模仿的現象。近代中國的學會便是此一消極模仿的產物之一；而傳教士與留學生，則為此一模仿過程的兩大媒介。

首先是西方傳教士等人物在各大通商口岸倡組學會，出版書刊，介紹新知，提倡改革。最早而有史跡可尋者是道光十四年（1834）成立於廣州的「益智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道光十六年（1836）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道光十八年（1838）廣州的「醫學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道光廿四年（1844）寧波的「促進女性教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道光廿七年（1847）香港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支會」（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咸豐七年（1857）上海的「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咸豐八年（1858）上海的「文理學會」（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同治十一年（1873）北京的「益智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光緒三年（1877）上海的「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光緒十一年（1885）福州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 M. C. A.），光緒十二年（1886）上海的「博醫學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

的「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光緒十五年(1889)分設於上海、天津、漢口、香港等地的「中國協會」(China Association)，光緒十六年(1890)上海的「中國教育會」(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光緒十六年(1890)杭州的「中華基督教女子青年會」(Y. W. C. A)，光緒廿一年(1895)上海的「天足會」(Natural Foot Society)等。<sup>④</sup> 這些學會間有西方官商創辦的，但多由來華傳教士所組合；他們推展的活動，倡導的新知，包括出版書刊，建立圖書館，設置學校，開辦醫院，統一科學名詞，改良社會風氣等等，對覺醒中的知識份子發生了絕大的啓蒙作用和先驅性的影響。

中國近代學會活動，由強學會開端，直迄民國十年，在時空架構上均曾經歷若干波折，在性質與功能方面，也曾產生若干變化。爲篇幅體例所限，在此不擬將此時期之學會一一窮舉或詳列其名稱及主要活動內容。就時間區劃而言，清末爲一段落，民初又爲另一段落，其間分野主要是辛亥革命所促成的傳統政治制度的解體。根據資料顯示，光緒廿一年(1895)至光緒廿四年(1898)爲學會發展的初期。光緒廿四年八月廿六日(1898, 10, 11)，由於戊戌政變關係，清廷嚴申黨禁，下詔禁止結社，學會活動因之遭受嚴重摧殘，漸趨銷沉，至光緒三十年黨禁解除後，復趨活躍。光緒廿四年的政變與黨禁，影響所及，顯然驅使中國覺醒的知識份子走向革命，參加革命性的黨會。至光緒卅年黨禁解除時，革命運動已澎湃湧成一巨潮，故光緒卅一年(1905)同盟會成立，吸收了大量的知識份子及學會活動的領袖人物，沖淡了秘密會社的色彩。由於日俄戰後立憲運動的蓬勃發展，清末學會活動以自治會，教育會爲主體，兼及風俗改良，且逐漸表現出趨向於專業性的特徵，如醫學研究會的成立。入民以後，此一高度業緣的趨勢更加明顯，在思潮取向上更有多元化的全面解放的傾向。

至於地域分佈，清末民初的學會活動的流播面，廣達十八省區以上。<sup>⑤</sup> 此一流

<sup>④</sup> 參看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頁三三至一二二。王樹槐：「清末繙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期。頁四七至八二。張玉法：「清季的立意團體」，頁一七七至一七八。

<sup>⑤</sup> 包括江蘇、河北、廣東、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山東、江西、廣西、雲南、貴州、山西、奉天、吉林等省。

播面構成了一個清晰的圖譜，以廣州、上海、北京三地為重點，先伸展到沿海各省，然後向內陸蔓延，主要沿長江流域，溯江而上，直抵四川，而以湖南為內陸擴散的聚點。這個簡明的圖譜，似乎也可具體而微的表徵出，在近代西方挾其文化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東漸以來，從中國沿海向內陸推展的線索，以及在中西兩大文化傳統接觸的邊緣地帶（marginal area），所產生的理性化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的點狀分佈的情形。

學會運動到了「五四時期」（1916—1921），進入了一個突進的時代。嚴復、梁啟超、胡適等無數的學者，前後所做的大量的，極具啓蒙作用的介紹和翻譯工作，為中國新生代貫注了鮮活有力的新思潮，建立了一種清淺的理智主義。這種清淺的理智主義，從清末醞釀到民初，至五四運動前夕已經相當成熟了。從「廿一條件」的提出到巴黎和會的屈辱，日本肆無顧忌的侵略野心促成了中國青年的救國運動。救國運動的狂熱和清淺的理智主義匯合成流，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浪潮。這股巨大的思想浪潮就是蔡元培筆下的「洪水」。<sup>⑥</sup>從文化的內隱面（covert aspect of a culture）轉化為文化的外顯面（overt aspect of a culture），廣大的知識青年在思潮猛烈的沖擊下，乃掀起了羣衆運動。表現知識青年的羣衆運動的基本而主要的方式是集會結社，印行書刊。根據統計，「五四」以後一年間（1919—1920），各校學生出版的大小刊物，總共在一千種以上，較顯著而流行的，至少也有四百種以上。<sup>⑦</sup>其中以「醒」字為標題者甚多。所以「少年中國學會」可以說是在一個空前的中國知識份子集體覺醒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 三、組合分化的過程與活動涵蓋的領域

探討少年中國學會發起的近因，不能不追溯民國七年留日學生罷學歸國一段史實。民國七年三月間，段祺瑞任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為貫徹他對中國武力統一的

⑥ 見蔡元培：「洪水與猛獸」；新青年七卷五號（北京，民國九年四月一日）。此文原是替「北京英文導報」的特別增刊而寫，胡適將其轉載於新青年。文中用「洪水」比喻新思潮，以猛獸為軍閥的寫照，認為中國當時的現狀，是洪水與猛獸的競爭。

⑦ 周策縱：「『五四』五十年」；明報月刊四卷五期（香港，1969，5），頁七。

政策，大事向日本借款，藉以擴充軍隊，強化武力。四月間，傳聞日本寺內內閣與段祺瑞密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有留日學生數十人，乃赴東京中國使館質問公使章宗祥，與館員發生衝突，被章宗祥召來日警，拘捕下獄者七人，遂引起學生公憤。至五月三日早晨，中日交涉條件公佈於日本報紙，其內容有「日本軍隊可以進駐吉林、黑龍江與蒙古一帶」，並有「日本得遣派海陸軍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等條款，留日學生界輿情大譁。四日晚開學生大會於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多數主張罷學歸國，表示抗爭。於是自五月至七月，先後自日本各地回到上海、北京的學生，陸續竟有二千多人之衆。

少年中國學會原始發起人之一的曾慕韓，其時也在日本留學，是主張罷學歸國最力的一人。他歸國後即與四川學生王宏寶、湖南學生羅季則等創立「留日學生救國團」於上海。曾慕韓不久又北赴天津，企圖擴大「留日學生救國團」的組織。但那時段祺瑞已採高壓手段，下令干涉留日歸國學生活動。曾慕韓只得與其中較熱心的分子聚於天津租界中，發佈排日文告，並組織國貨販賣部，以實行抵制日貨。但這個抵制日貨運動，因得不到社會普遍的助力，旋即解體。曾慕韓慨然重返北京，與王光祈商討此事，遂決心發起少年中國學會。<sup>⑧</sup>

曾慕韓的「戊午日記」於此事始末有相當翔實的記載，<sup>⑨</sup>字裏行間充滿悲憤與焦慮。茲徵引數則，以見當時醞釀組會情形之一斑：<sup>⑩</sup>

民國七年四月一日：「……思予擬集合同志，提倡分業，爲一真正之學會，各就所學，輪流演講，要以根於學理，按諸事實爲主，冀收切磋之實效，頃與友人談及，頗多贊同，其或有成乎？」

同年四月五日：「……昨日湯濟武君談話有可記者，即謂十年以前，彼等但知當變法，而不知所以變之之道，是以國愈亂而術已窮；十年以後，國事當屬少年，若再無素養，國將何望？言頗沉痛也。」

同年五月四日：「……晚偕夢九、眉生、若飛赴留學生總會討論歸國事，

<sup>⑧</sup> 參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二章「五四運動與少年中國學會」；傳記文學十六卷四期（臺北，民國五十九年四月），頁八。

<sup>⑨</sup> 「曾慕韓先生遺著」（臺北，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頁三七一至四七五。

<sup>⑩</sup> 前數則記於日本，曾慕韓時在東京。六月二十日以後日記爲返抵國門後所記。

至十鐘始散會歸，予於茲事固亦主張回國，惟所斷斷者，回國後之辦法如何耳。」

同年五月五日：「…附記是日湖南及貴州同鄉會，均因開會討論歸國事，被日警禁止，且將代表拘去。嗚呼！國未亡而身已不自由，島夷橫肆，可勝歎哉！」

同年五月十日：「晨寫上梁任公一函，交眉生回國帶呈，勸其出而辦學校，以收容近日廢學歸國之青年也。」

同年六月卅日：「晨取愚生所有舊報，展開良久，午後潤璵、太玄來，約同愚生、夢九、眉生六人赴南橫街嶽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並決定今後行止，相約無背規約焉。……」

同年七月十二日：「……晚偕夢九、眉生赴中央公園，與潤璵、太玄約會，潤璵出所擬少年中國學會宣言及改定章程，相與討論，至十鐘始寢。」

同年七月十四日：「晨偕愚生、夢九、眉生赴南橫街嶽雲別墅，與潤璵、太玄約會，商議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並討論章程。……」

同年七月廿一日：「午後潤璵、太玄來鈔寫少年中國學會章程，旋以電話邀李守常來寓，約渠加入學會，縱談至晚十鐘始去，甚相愜也。」

同年七月廿八日：「……往謁梁任公，以學會章程及公函呈閱，請渠為贊成員，得其允許，並相與傾談良久。……」

日記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直到七月廿一日，曾慕韓等始邀李守常入會，故李守常並非六月卅日嶽雲別墅會議中的原始發起人。日記中屢次言及的潤璵，即該學會早期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人物王光祈。據曾慕韓後來告訴會員之一的李璜說，當他自日本返抵北京的第一日，即晤見王光祈，討論如何在北京推動救國團的團務，王光祈便向曾慕韓說：<sup>①</sup>

<sup>①</sup> 曾慕韓於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由日返抵天津，二十五日午刻抵北京。「戊午日記」六月二十五日條載：「……晚潤璵亦來，暢敘別後情形及近來所抱理想，並留同宿焉」。此段話顯係該晚兩人談話主要内容之一。見「曾慕韓先生遺著」頁三九一。

「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爲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是在反對段內閣；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且即使發起，也只是一闕之局，勢難持久。因二、三千人一旦罷學回國，聲勢雖大，而其中大多感情用事，以之而言救國，則辦法當不如是之簡單。我們皆在青年求學時期，救國最好在早做基礎的準備工夫，而準備工夫不外兩事：一爲人才，二爲辦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已成勢力中，則應早日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爲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實際問題的解決。至於辦法，也非淺識玄想，徒託空言，便可以適合國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須每個同志都去增進自己學識，從事各種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學術，又必須本科學的精神方不流於空疏。」<sup>⑩</sup>

這段談話，足以表現王光祈穩健的性格與深思的見解；曾慕韓乃引爲知己，留他作長夜談。其後幾天的磋商，他們漸漸歸納出相當的結論，而有六月卅日嶽雲別墅的會議。根據「戊午日記」，參與這次籌備會議者有曾慕韓、王光祈、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周太玄；此六人便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發起人。其中曾慕韓、王光祈、陳愚生、周太玄四人爲四川人，而曾慕韓、陳愚生、張夢九、雷眉生四人爲留日學生，故原始的少年中國學會可說是以四川人，以留日學生爲主幹的團體。

嶽雲別墅的會議公推王光祈爲籌備主任兼會計，直到民國八年七月一日，正式召開成立會時止，整整一年中，會務均由王光祈負總責。他到處奔走，廣徵會員，並發行會務報告，故在北京召開成立會時，遂被選舉爲執行部主任。此時會員已多達七十四人，其中包括各大城市及國外的學生，教育工作者，新聞記者及作家。學會的宣言，宗旨，信條及規章，幾由王光祈一人起草。在宣言書中有一段重要的話，最能表達他們當時的心思與理想：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簡樸。務使

<sup>⑩</sup>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二章「五四運動與少年中國學會」；傳記文學十六卷四期（臺北，民國五十九年四月），頁九。



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sup>⑬</sup>

根據此一宣言，又寫定了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

「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

而規章中第一條是：

「本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sup>⑭</sup>

又簡化成四項信條：

「奮鬥，實踐，堅忍，簡樸。」

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後所積極從事的活動計有兩方面：一為出版書刊，介紹並研討新思潮；二為倡導社會活動，主要的是辦理工讀互助團和推展新村運動。

少年中國學會先後編印的書刊頗多，除籌備期間的「會務報告」外，最主要的是「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世界」月刊，「少年社會」和「星期日」週刊，以及「少年中國學會周年紀念冊」，「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通訊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等小冊子，另有「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會務報告」是在籌備期間發行的，每月一冊，自民國八年三月一日至「少年中國」月刊出版時停止，共出四期。其中多登載「會務紀聞」，「會員消息」，「會員通訊」，「本會通告」之類的文字，幾佔篇幅一半，提供了研究早期學會活動和思想的寶貴材料。

「少年中國」月刊由北京總會負責編輯，每年出刊十二期合為一卷。第一卷第一期於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出版，至民國十三年五月共出滿四卷十二期以後停刊，中間曾休刊數次。為一綜合性雜誌，內容可分兩大類：第一類是會員所寫的關於自然科學、文學、哲學和社會學的論著與譯作，廣泛討論人生觀，世界觀和社會問題，為該刊的主要部份。此外，當集中研究某一問題時就出版專號；其中如一卷四期的

<sup>⑬</sup> 周太玄：「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二二。

<sup>⑭</sup> 「少年中國」月刊均標出學會的宗旨與信條，並將宗旨譯成英文：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婦女號」，一卷八、九期的「詩學研究號」，一卷十一期的「新唯實主義號」，二卷四期的「法蘭西號」，二卷八、十一期，三卷一期的「宗教問題號」，三卷七期的「相對論號」。第二部分是「會務報告」的延續，包括一些闡述學會方針的文章，會務消息和會員通訊。至三卷二期及三卷八期，曾分別出過兩期「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號」，提供了會員思想分化的消息線索。三卷以後的「附錄」中常登載關於留法勤工儉學生的活動。初步估計，「少年中國」月刊的銷行網廣達九個省份，並遠及日本。<sup>⑩</sup>

由於體例的限制，「少年中國」月刊，側重理論性的探討，只刊登關於哲學、文學、純粹科學的文章，因此會員中不少應用科學與實際調查的文章無從發表。爲了適應這個需要，經會員提議，決定發行第二種月刊「少年世界」。<sup>⑪</sup>這份刊物，由南京分會負責編輯，創刊於民國九年一月一日，終刊於同年十二月，共一卷十二期。民國十年四月，又出一期增刊「日本號」，分別介紹了日本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社會現狀及民族性格和思想等。這份刊物分別闢有「學生世界」、「教育世界」、「兒童世界」、「婦女世界」、「學術世界」、「勞動世界」、「學校調查」、「工廠調查」、「地方調查」、「森林調查」、「農村生活」、「華僑消息」、「社會批評」、「世界大勢」、「讀書錄」、「出版界」、「游記」、「雜錄」等欄。於發刊詞中，對這種編印方式曾有清晰的說明：

「……………我們以爲改造中國——卽是改造世界的一部份——應有三種的步驟：

---

<sup>⑩</sup> 「少年中國」月刊早期收集稿件處設北京東華門北河沿宗人府東巷東口內蓬廬內，由王光祈負責實際編輯事務。總發行所設在北京馬神廟東口松公府七號，由蘇甲榮負責接洽。其他設有十六個代派處：北京國立大學出版部、北京清華學校出版部、北京琉璃廠中華書局、北京青雲閣富文書店、天津中華書局、上海亞東書局、成都桂王橋派報處、濟南院前一一號齊魯通訊社、南京四象橋舒城黃宅、杭州平海路教育潮雜誌社、浙江嘉興烏鎮西市徐第健文圖書館、梧州大南門通學書局、南寧嶺表日報館、長沙儲英源體育週報社、開封青雲街中間心聲雜誌社、東京小石川竹早町一一六中華踐實齋沈懋德。當時售價每冊大洋一角，外埠加郵費二分，每年十二冊大洋一元，外埠加郵費二角。詳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封底。

<sup>⑪</sup> 見「少年中國」月刊一卷六期「學會消息」。

第一步，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於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

第二步，詳細記載由現代思潮演成的事實，給中國人一種更深的刺激。

第三步，根據思潮和事實的趨勢，草一個具體的改造中國的方案。

『少年中國』月刊是做的第一步工夫。

『少年世界』月刊便是要做這第二步工夫。

這第三步工夫要讓中國全體青年去做。

我們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這本月刊裡所記載的，便是各種『社會的活動』，而且他的範圍永遠限於『社會的活動』，決不會談政治。

我們學會的第一個朋友便是學生，所以我們對於學生的消息特別注意。其中尤注重國內外各學校的詳細調查，給現在的中學生一個『入學指南』。

我們學會的第二個朋友便是勞動家，所以我們對於華工消息，工廠調查，農村生活特別注意。

我們學會的第三個朋友便是華僑，所以我們對於華僑消息特闢一欄。

其餘各欄的紀載，或是社會上的黎明運動，或是關於各種科學的專論，可以供我們青年的參考資料。……」<sup>①</sup>

從上述引文所標舉的旨趣看來，「少年世界」似是比「少年中國」在精神上更富於本土化與通俗化的一個「社會活動」的刊物。為人力資力所限，此一刊物未能持久編印，對少年中國學會其後思潮取向的發展，頗有影響；最明顯的一點是，倡導的社會活動從此缺乏實際材料的印證，於是逐漸走上理論化的道路；拋棄了本土化的社會活動的目標，而開始以接受與整理外來文化為方向，其後並表現了強烈的干政慾望，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幸的轉變。

「星期日」與「少年社會」是兩份週刊。「星期日」是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主編的，創刊於民國八年七月十三日，為時一年，共出五十二期。每一期銷行量達

<sup>①</sup> 見「少年世界」月刊一卷一期「少年世界發刊詞——為什麼發行這本月刊？」

三千份以上，對四川一地知識的傳播與思想的啓蒙，自有相當的影響。<sup>⑮</sup>

「少年社會」雜誌創刊於民國八年十二月一日，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主編，前十期爲週刊，至民國九年四月一日改爲半月刊。雜誌社社員中如王克仁、邵爽秋、楊賢江、倪文宙、曹芻、金海觀等，均先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所以這份雜誌雖非少年中國學會直接編印，但仍具有間接的密切關係。

除編印上述雜誌以鼓吹新思潮外，少年中國學會「社會活動」的理想主義格調，還表現在工讀互助和新村運動上。新村運動顯然是承受了日本日向新村的烏托邦社會運動的感染。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一班人，因爲極不滿意於當時日本的現實社會，對於「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制度，感到不能容忍，却又不贊成「暴力」改革，遂於無可奈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劃來。他們在風景悠美的日向，經營農場，開闢新村，希望藉這種和平的，退隱的方法，來脫離現實社會，去過一種模範的，獨善其身的理想生活，這是近代新村運動的一支。新村運動淵源於克魯泡特金（Kropotkin）、托爾斯泰（Tolstoy）及其他理想社會主義者的人道主義的哲學基礎上，而其理論與組織在民國八年，曾由周氏兄弟（周作人，周樹人）及其他作家，於「新青年」、「新潮」等雜誌上爲文介紹。周作人於民國八年七月間訪問日本東京等地的新村；周樹人則翻譯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在民國八年八月刊登於「國民公報」。同年十月廿五日，「國民公報」爲北京政府查封，其譯稿乃由「新青年」繼續轉載。<sup>⑯</sup>於是武者小路實篤一班人的夢想與行徑，遂普遍地爲當時苦悶中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同情嚮往。以王光祈爲中心人物的少年中國學會，本著社會活動的旨趣，又受了新村運動的影響，乃倡導新生活的小組織。「少年中國」月刊從第一卷第二期開始刊有討論小組織的文字。其中王光祈、左舜生、宗白華、黃仲蘇等會員，都有小組織的具體提議。他

---

<sup>⑮</sup> 「星期日」週刊首任編輯爲李劫人，他不久赴法勤工儉學，改由會員孫少荆和穆世清等人主編。至三十六期（民國九年四月）少年中國學會成部分會的會員相繼離去，乃另成立「星期日周報社」，獨立經營業務。成部分會會員，此後即以個人身份參加周報社工作。詳見「五四時期期刊介紹」，頁二八〇。

<sup>⑯</sup> 見「新青年」第七卷第二期至第七卷第五期。

們的共同見解可以王光祈的意見為代表：「……爲了避苦尋樂，以遂行圓滿的人生，在這種惡劣的社會裡，如要得到學術上的進步，精神上的快樂，保持高尚的人格，改善不良的生活，免除家庭的苦惱等等目的，只有由少數人去實行新生活的小組織，以勞動所得，自立互助，進而改革社會。……」這也是王光祈提倡「團體生活與勞動習慣」的一貫主張。他又具體規定小組織設在都市的近郊，勞動方式是種菜園每天兩小時，翻譯書籍三小時。種菜所得可解決物質需要，讀書可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通過譯書可以介紹歐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翻譯的書由自辦的印刷所出版，利潤一半給譯者，一半歸公；另附設平民學校，免費教育農家子弟，並時常接近農人，使純潔的青年與農夫打成一氣。這種構想，簡直是「烏托邦」（utopia）的雛型了。<sup>20</sup>受了新村運動及勤工儉學留法風氣的鼓舞，又得到教育文化界的名流蔡元培、胡適、周作人等的熱心支持，王光祈進而把小組織的主張具體化，且付諸行動，而倡辦工讀互助團，計劃在每一個城市裡，組織一個男女生活的互助社，以幫助青年脫離家庭的壓制與束縛，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與互助勞動的習慣，並給予讀書上進的機會。<sup>21</sup>

王光祈倡辦「工讀互助團」，從其多方奔走募得一筆基金，<sup>22</sup>先在北京試辦，隨因上海、南京、武漢及湖南等地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支持，各地也紛紛創立同樣組織。當時規定入團者每天至少必需工作四小時，所得悉數歸公，其生活及上學、醫藥、住宿、衣服、書籍等費用，均由互助團供給。<sup>23</sup>他們舉辦的事業包括開書店

<sup>20</sup>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頁二四三。

<sup>21</sup> 據孟壽椿在「五四運動時代王光祈先生的奮鬥生活」一文中追懷說：「他對一般貧寒子弟最爲同情，一次在李晨女士的追悼會裡（李女士係女高師高材生，因受家庭的經濟壓迫而自殺者），他帶着很興奮的樣子向我說道：『我已想得一法，使寒士能够讀書』，回寓後，即草擬工讀互助團的辦法。次日即四出奔走，開始組織，不一月而招得男女團員數百人，織布織襪以自給……」。見「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六一。

<sup>22</sup> 爲數一千餘元。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會員通訊」頁六五，王光祈於民國九年十二月十日寄自德國佛郎克給渾代英的一封信。又周策縱在其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一書，頁一九一，列有一張捐款者名單，可參看。

<sup>23</sup> 王光祈：「爲什麼不能實行工讀互助主義」；「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民國九年四月一日）。當時規定每月每人消費十元，其分配方法如下：（一）房舍一元五角，（二）伙食三元，（三）學費二元，（四）衣服費一元，（五）書籍費一元，（六）醫藥費及零用一元五角。

、印刷廠、廉價飯館、洗衣店，以及手工藝的製銷店等。王光祈後來又試辦農村生活計劃，讓團員下鄉，半耕半讀。

但及民國九年二、三月間，北京工讀互助團漸陷入窘境。王光祈檢討原因，認為「是人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因為「工讀互助團發起的時候，報名的有數百人之多。發起人對於團員雖曾經過一番審慎的選擇，但是團員中果能具備這八個字（既能了解，又能實行）的資格，實不多見。」<sup>②④</sup>

然而王光祈對這種困難相信有解決的辦法，持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仍有試行成功的希望，但當時持悲觀的態度，並寫文章批評者，已不乏其人。

戴季陶認為：「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世界的強力，壓迫著自由勞動者的時代，無論什麼人，沒有不受這一個強力的支配。而威迫各人的社會生活，妨礙學生的自由思想，為主的並不是家庭、不是官廳、不是學校，只是資本家生產法所代表的財產私有制。在這一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作生產的工，一面達求學的目的，在事實上是作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練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產機關，要想獨力回復資本家生產制所侵蝕的『剩餘勞動時間』，更是作不到的」。因此他提出的意見是：「有改造社會的熱誠和決心而又肯耐苦冒險的青年，既不願意附隨着惡社會過生活；又不能夠達工讀互助的目的；便應該拿定普遍救濟的目的；舍去一切獨善的觀念；投向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工場去」。他認為這是訓練與試驗的唯一方法。「倘若失敗了，也可以對世界上供給一個研究材料。」<sup>②⑤</sup>

胡適曾分別發表「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工讀主義的試行觀察」兩文，對這個運動的失敗，有平情的分析和深銳的批評。他認為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只「承認這個現社會沒有法子挽救的了」，所以「要想在現社會之外另尋一種獨善的理想生活。」這是格外危險而應該反對的，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他指責在汎勞動主義信仰支配下的新村生活，

---

②④ 同上。

②⑤ 戴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制」；「新青年」七卷五號（民國九年四月一日）；「工讀互助團問題」頁五至一二。

「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工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而且「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這個觀念，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裡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却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的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sup>26</sup>

胡適進一步批評「工讀互助團」的不切實際，指出他所觀察的兩件事實：「(1)工作的時間太多，每人七小時以上，十時以下，只有工作的時間，沒有做學問的機會。(2)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簡單的，機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應。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我也是北京發起人之一，但我是見慣半工半讀的學生生活的，覺得『工讀主義』，乃是極平平無奇的東西，用不着掛什麼金字招牌。……現在有許多人把工讀主義看作一種高超的新生活。北京互助團的捐啓上還只說『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上海互助團的捐啓便老實說：『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來。』新生活和新組織也許都是很該提倡的東西，但是我很誠懇的希望我的朋友們不要借『工讀主義』來提倡新生活新組織。……」他敦勸「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畫怎樣才可以做自修的學問的方法。」<sup>27</sup>

新村與工讀試行失敗的現實經驗，影響到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對社會問題的看法；這一運動的失敗，使他們體認到如果都市的勞工者與資本家間沒有合作，則要在經濟社會的改造中去創造一個烏托邦是不可能的。而此後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感情的紛歧與思想的分化，也肇端於此。

少年中國學會自民國七年至八年為籌備時期，民國八年至十年為發展時期，民國十年以後為分化時期。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到四日曾召開南京大會，<sup>28</sup>會中出現了關

<sup>26</sup> 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胡適文存」第一集（臺北，民國四十二年），頁七四三至七五四。原文為一演講稿，曾登於民國九年一月十五日「時事新報」。

<sup>27</sup> 胡適：「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新青年」七卷五號，「工讀互助團問題」頁一至五。

<sup>28</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南京大會紀略」。開會地點七月一日在鷓鴣寺，二日在玄武湖，三日在清涼山，晚在高師梅庵，有一次則在高師農場。

於應否參加政治活動，應否確定主義的激烈爭辯。出席南京大會的會員共二十三人，<sup>⑳</sup>雖沒有正式的代表名義，實際却代表各地和各派會員的思想，而其分化的趨向已極明顯。除會中發言外，不少會員在會後通過了書面提議或發表文章，傳達自己的意見。這些言論彙集為兩期「少年中國問題專號」，刊登於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及第三卷第八期，是研究學會分化過程的重要材料。參與書面討論者有王克仁、張聞天、余家菊、楊賢江、沈澤民、陳啓天、王光祈、鄭伯奇、沈懋德、李璜、沈怡、左舜生、鄭伯奇等，而巴黎分會與成都分會也各有提案。王光祈當時遠羈德國，對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發展仍懷抱着深摯的關切，他的書面提議長達千餘言，包括七點具體的方案：<sup>㉑</sup>

(一)按照會員終身學術終身事業表，速組織某項學術某項事業研究會，參加非會員。

(二)將月刊改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藝三種專門性質之雜誌，仍用月刊名義，每年仍出十二期。惟每期皆出特刊號，三種各出四次。每次卷面上標明某某特刊號（如自然科學特刊號之類）。三種編輯由各地會員分任。每次特刊號之後，附列「創造少年中國問題」——包含社會問題修養等項文字——及「學會消息」兩欄，由上海編輯。

(三)學會不標某種主義之籠統名稱，而對於將來之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及其進行步驟運動方法，皆加以極具體之描寫。如果此種具體描寫之組織及方法已為同人所贊成，將來即以此種組織及方法作為本會對於某項事業進行之方針，換言之，即本會主義。

(四)本會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今年大會時須加以極明確之規定。倘有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

(五)除討論學問之通信在月刊發表外，所有關於討論會務及個人生活之通信

⑳ 王克仁、邵爽秋、楊效春、方東美、陳啓天、譚代英、楊賢江、蔣錫昌、李儒勉、陳愚生、高尚德、趙叔愚、沈君怡、劉衡如、陳仲瑜、沈澤民、張聞天、左舜生、阮真、劉仁靜、鄧仲澤、穆濟波、黃日葵。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南京大會紀略」。

㉑ 詳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二八至三〇。



由執行部收集編訂成冊，寄與各處會員傳觀。傳觀路線，先國內，後日本，美國，歐洲，南洋，仍寄回執行部保存。

（六）會員出國者日衆，國內會員又復散居各地，故最近四年內之會務，只希望下列六種：

（甲）整頓少年中國月刊。

（乙）編輯叢書。

（丙）組織學術或事業研究會。

（丁）力謀會員間之相互了解，如傳觀通信之類（此事由執行部以全力辦理）。

（戊）擴充國外通信事業之類（如通信社及私人特約通信之類，由國外同人以全力進行）。

（己）介紹會員（由評議部以全力注意此事）。

（七）四年之後，本會事業分二種：

（甲）地方基礎事業

小學校	}	正業
農村		
譯書事業		
編輯少年中國		
兼任地方上各校之教員		——附業

（乙）都會宣傳事業

各校教員	}
各報新聞記者	
國外通信員	
各工廠之工程師	
加入其他社會事業之活動	

巴黎分會提案，對於學會標明主義認爲非必要，「因此時定一主義在事實上既甚困難，且與吾會作預備功夫之精神相反」，<sup>⑤</sup>而對王光祈改革月刊，成立研究會

⑤ 「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四二。

的建議則表示贊同：「月刊之改良問題，同人等雖亦贊成德國同人改月刊為三種專門性質之雜誌，但以爲宜先成立科會，至少亦應先成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三種之研究會，爲專門季刊之基礎。」<sup>②</sup>七月一日的大會即分別討論了「月刊問題」，「研究會問題」，「叢書問題」，「會員間通信問題」。其中「研究會問題」曾引起與會者共同的關切，似乎大家都體認到這一問題對少年中國學會的前途的重要性。討論結果，全體主張將研究會分兩種：（一）學科研究會，爲永久的；（二）問題研究會，爲臨時的。每一會員，同時可入兩個以上的學科研究會。問題研究會，更可自由加入，非會員亦得邀請加入。當時計劃成立的學科研究會計有：教育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心理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社會學研究會、經濟學研究會、生物學研究會、土木工程研究會、地質學研究會。結論中並聲明：「研究會運動，關係本會前途極鉅，如不組織完好，本會一切計劃均無從進行，應請國內外會員特別注意。最好此期月刊發表後，於半年中將各種研究會全部成立，積極進行。此次大會所舉出之九種研究會，係限於到會會員研究的範圍，未到會會員，其研究興趣不屬此範圍者，當然另行組織。……」

分科研究會的計劃，是少年中國學會走向高度業緣化的一個重要的轉機，其後未能本此理想推展成具體的事實，是導致學會運動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亦爲中國近代社會專業化運動中一個極富警惕性的失敗的個例。

七月二日在玄武湖及當晚在南高農場的會議中，分別討論了「宗旨主義問題」「政治活動問題」，及「宗教信仰問題」。會中發言踴躍，辯論異常激烈，有少數人幾至以去就力爭。於是次日（七月三日）在清涼山掃葉樓及當晚在南高梅庵的會議中，遂有「學會前途的危險，應討論如何決裂」一案的提出。爭論的焦點是「宗旨主義問題」、「政治活動問題」、「宗教信仰問題」，而思想的分野則漸趨兩派；鄧仲澥、黃日葵、高君宇、劉仁靜、沈澤民等爲社會主義派，他們主張確立一種共同的主義，自有其強烈的政治背景。當時正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夕，早期會員中的激烈份子李守常，在北京與蘇俄前後派來中國的代表已有密切的往來，而且在少年中

<sup>②</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四三。另蔣錫昌對研究會問題亦有具體提案。

國學會會員中宣傳共產主義，並組成「社會主義研究會」，上述主張確立共同主義最激烈者均為該會會員。當時計有主張不要主義者六人，主張要主義者十七人。這十七人中有的主張研究主義，有的主張規定最小限度的一致，<sup>③③</sup>而上海、南京去參加的會員，則大多不贊成少年中國學會確立主義，成立政黨從事政治活動。<sup>③④</sup>意見錯綜紛歧，以後遂未付諸表決。乃分就七個「決裂」的問題，要求會後至年底徵求全體會員意見，再行決定：

- （甲）主張有主義與無主義者的決裂。
- （乙）主張參加現政界與主張絕對禁止的決裂。
- （丙）主張宗教信仰自由與主張絕對禁止的決裂。
- （丁）主張實踐戀愛自由與反對的決裂。
- （戊）主張只對第四階級做事的與反對的決裂。
- （己）主張單純講學與反對者的決裂。
- （庚）由無共同一致之點所生不互相信任不信任學會的感情的決裂。<sup>③⑤</sup>

此外，會中提議取消信條，修改規約，均未實現。<sup>③⑥</sup>在少年中國學會思想分化的爭辯過程中，王光祈是始終不贊成以任何政治運動為主體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他在書面提案中堅決表示：「本會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今年大會時須加以極明確之規定。倘有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

在民國十年十一月一日發行的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有一張通告寫出當時會員已交會費或未交會費者的名單，略可反映出當時會員間的關係已由疏離而

---

③③ 如以地質學著名的楊鍾健即主張：「求一致的共同主義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個最大與最小的限度的一致便可以了。學會最好只成爲一種研究學術教育的會」。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五四。

③④ 楊賢江發言：「今日發言者北京同人多主張要主義，南京同人多主張不要主義，顯然呈地方色彩。這可見環境勢力的影響。外界事實變了，規定的主義亦要變，那便求主義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我贊成（渾）代英只求最小限度一致之說」。

③⑤ 「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頁五十七。

③⑥ 同上，頁五十八。

淡漠了。當時會員八十三人中，已交會費者僅十七人，而未交會費者多達六十六人，其中留學或旅居國外者卅七人。另有執行部通告二張，顯示當時未簽交「入會願書」者廿三人，未填寫「終身志業表」者廿七人。組織型態的鬆散造成了活動功能的減退，少年中國學會結合理想的幻滅，不僅由於思想分化一端而已。

南京大會以後，學會活動已日漸衰微，會員偶有增加，但會務則漸趨沉寂。國外會員本來無法直接參與國內會務，各人均以學業事業日夜奔忙，最多只能利用月刊發表文章，以通信表示意見。國內會員有一部分一直沒有積極參加學會活動，而熱心份子之中，又因政見的差異而日趨分歧。民國十一年七月的杭州會議，十二年十月的蘇州會議，均只有少數南京和上海一帶的會員就近參加，學會早期新銳的旺盛的生命力已經消失殆盡了。到了十三年蘇州大會，國家主義派和社會主義派，發生了正面的、激烈的衝突，情勢更加惡化。至十四年夏天（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第五屆年會在南京東南大學梅園召開，出席會員僅十八人，社會主義派與國家主義派在會中相互駁難，討論學會對時局態度一案，竟相持數日，毫無結果。部份中立的會員目睹這種激烈爭辯的情形，憂慮團體瀕於破裂而不可收拾，黃仲蘇乃提出緊急動議，於即日起停止介紹新會員，設立改組委員會。由年會授予調查及改組全權，擬具表格及規約，分別調查會員思想及對學會態度，並請報告入會以後學業與事業之成就。調查期限自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起至十五年二月底止。改組委員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及規約處置一切。這一提案，當時經出席會員全部同意接受，並票選舒新城、李儒勉、金海觀、曹芻、黃仲蘇五人為改組委員會委員，負責辦理調查及改組事宜。自民國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起至同月二十九日止，陸續分別掛號，由郵政局寄出國內外各地會員調查表格正副兩張共計一〇二份。少年中國學會此時會員增至一〇八人，而自請退會或死亡者已有六人。所得結果，因國內外會員住址更改，無從投遞，而陸續退回的調查表格計四九份。確已收到表格而逾期未填報者計十九人，確已收到表格而來函說明不願填報者一人。填具表格寄回審查者卅三人，僅佔全部會員名額三分之一弱。而填具表格者意見又極紛歧；其中：

（甲）主張少年中國學會應保持為無黨派者，計宗白華等十七人。

（乙）表示對少年中國學會至為愛護，並希望大家目前勿談主義，仍當携手合

作以準備救國工作者，計沈君怡等七人。

（丙）提議將少年中國學會澈底澄清，改組成爲某一種主義之集團者，計李璜等五人。

（丁）贊成將少年中國學會解散，以免爲某一黨派所挾持者，計鄧仲澥等三人。

（戊）確認少年中國學會是社會活動團體，不能開除政治意見不同之會員，並提出具體方案，以改進會務者，僅王先祈一人。

改組委員會面臨如此混亂的局面，乃議決暫不採取任何行動，僅將業已收到之調查表格分別記錄，留待下屆年會提出報告，再行討論如何改進會務。<sup>⑳</sup>

此時少年中國月刊已先於民國十三年五月印行第四卷第十二期後停刊，而第六屆年會也始終未見召開，從此會務陷於停頓，形同解散。

從民國七年六月卅日，北京獄雲別墅的六人聚會，至十四年七月廿日，十八人出席的南京第五屆年會止，少年中國學會的壽命共計七年零十天。時間架構不長，但活動的領域則相當遼闊。早期總會設於北京，民國十三年則遷往南京。成都設有分會，而湖北、湖南、山東、天津、上海等各大省市，均有會員活動的足跡；國外則在法國的會員最多，設立巴黎分會，<sup>㉑</sup>在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及南洋各地，均有會員的行蹤。而留德學生組織「中德文化研究會」，發起人中即有部份爲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sup>㉒</sup>綜觀少年中國學會活動的領域，在國內則廣達六個省區以上，在國際則廣達六個國家以上。前後正式入會的會員應爲一〇八人，而可查證者有一〇七人。<sup>㉓</sup>就鄉土成分而言，其籍貫分佈廣達十三個省區：四川廿七人，江蘇十七人

⑳ 黃仲蘇：「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見「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附錄。

㉑ 巴黎分會於民國十年三月成立，詳情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

㉒ 發起人爲：魏嗣鑿、鄭壽麟、詹學時、張夢九、陳鶴鳴、孫少荆、金其眉、宗白華、吳屏、王達生、王光祈。

㉓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二章「五四運動與少年中國學會」；「傳記文學」第十六卷四期，頁十五至十六。

(1) 四川籍：王光祈（潤興）、周太玄（無）、陳愚生（清）、曾慕韓（琦）、李璜（幼樁）、何魯之、魏嗣鑿（時珍）、江彭舉（雲生）、劉正（泗英）、楊永浚（叔明）、趙世炎、李劫人（家

，浙江九人，湖南八人，湖北七人，陝西七人，安徽五人，江西五人，河北三人，廣東二人，廣西二人，山東一人，貴州一人，不明籍貫者十三人。從學會一紙名單及其活動的歷史看來，其組成份子顯然具有全國代表性。學會的分化雖然顯示了一幅悲劇性的歷史圖象，但超地緣的組合仍然足以代表大羣意識的產生與普化，這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上是極具歷史意義的。

#### 四、組織結構的型態與重整反應的思潮

介紹新知，傳播思想，是文化價值的「有形功能」(formal function)。少年中國學會在這方面所投注的某些影響是清晰易見的。但另一方面，少年中國學會也

---

詳)、康白情(洪章)、李思純(哲生)、雷國能(人百)、孟壽椿、穆濟波、盧作孚、段調元(子燮)、羅世嶽(沅叔)、鄒祥禔(公復)、王德熙、張明綱、趙叔愚、李珩(曉舫)、胡助(少襄)、周曉和。

- (2) 江蘇籍：曹弼(漱逸)、楊賢江(英甫)、沈澤民、侯紹裘、宗白華(之樞)、吳俊生(士選)、邵爽秋、王崇植(受培)、惲震(蔭棠)、吳保豐、劉國鈞(衡如)、朱自清(佩弦)、湯元吉、常道直(導之)、唐啓宇、陳平甫、張聞天。
- (3) 浙江籍：周炳琳(枚蓀)、沈昌(立孫)、朱鏡宙(鐸民)、楊仲楹、阮真(樂真)、倪文宙(哲生)、金海觀(曉晚)、沈怡(君怡)、楊效春。
- (4) 湖南籍：左舜生(學訓)、毛澤東(潤之)、鄧仲漣(康)、田漢(壽昌)、周佛海、易家鉞(君左)、易克嶽、舒新城。
- (5) 湖北籍：余家菊(景陶)、陳啓天(修平)、劉仁靜、惲代英、涂開興、劉拓(泛弛)、惲代賢。
- (6) 陝西籍：雷眉生(寶菁)、張夢九(尙齡)、鄭伯奇、高君宇、芮學曾、雷寶華(孝實)、楊鍾健(克強)。
- (7) 安徽籍：黃仲蘇(玄)、方東美(珣)、謝循初、汪奠基、趙曾儔(壽人)。
- (8) 江西籍：許德珩(楚僧)、陳寶鏞(劍脩)、陳登恪、徐彥之、李儒勉。
- (9) 河北籍：李守常(大釗)、袁同禮(守和)、張申府(崧年)。
- (10) 廣西籍：黃日葵、蘇甲榮(演存)。
- (11) 山東籍：沈懋德。
- (12) 廣東籍：古棣、梁紹文。
- (13) 貴州籍：王克仁。
- (14) 籍貫不明者：陳政(仲瑜)、蔣錫昌、湯騰漢、章一民、劉養初、羅元愷(舉白)、黃竹華、唐愨、李祚利、張滌非、陳道衡、章志、趙世炯。

代表了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其歷史意義較難偵測，因為這是一種「無形的功能」（informal function）。

傳統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緣性和地緣性。以近代觀點來看，這種高度的血緣性和地緣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強了小羣的觀念，削弱了大羣的意識，同時也支離了近代整體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因而延緩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從歷史觀點看來，血緣組織如家族制度，地緣組織如會館制度，都是因應傳統社會某些階段中實際的需要而產生的，都曾具有積極的社會與經濟的功能。但從近代化的角度立論，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統一國家的形成有賴於大羣意識的產生，而大羣意識的產生有賴於親屬關係與畛域觀念等意識型態的消融。<sup>④</sup>清末民初以來，由於近代水陸交通的發達，西方思想的輸入，民族主義思潮的沖擊，工商組織新法令的頒佈，都加速了小羣組織的衰微，助長了大羣意識的產生。最能指示這種趨勢的是地緣性的會館制度的蛻變和衰微，以及學會活動的蓬勃發展。

會館制度到了清代以後，已漸見「多鄉性」，表現了超地緣的色彩。同時有同業公所一類業緣性的組織出現；如雍正元年（1723），歸綏即有「十二社」與「十三行」的成立。其性質與歐洲中古城市之基爾特商行（gild merchant）及近代城市之總商會相似。<sup>⑤</sup>但這類組織，實際上只有行業性或職業性的（Occupational），而非專業性的（professional）。而且這類組織潛存著中國傳統社會中職業或行業的血緣繼替的本質，故往往揉雜了血緣的色彩。職業性組合是以經濟利益為前題的，而專業性組合則以文化知識為前題，兩者間的性質與功能有其根本的差別。近代西方的職業性社團如同業組織（industriail organization），是承襲中世紀基爾特（gild）而來，為雇傭者的組合；另有工會（union）一類組織，是被雇傭者的組合；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兩者往往處於對立的局面。專業性的組織大致可區分為純學術（pure academy）的，是「學者的學會」（a society of learned men），民國以來，如「中國科學社」和「地質研究會」等是。另一種為「科學技

<sup>④</sup>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引言」，（1966，臺北，學生書局印行），頁一。

<sup>⑤</sup> 同上，第六章「會館與地域觀念的逐漸消融」，頁一〇一至一一四。

術」(scientific technology)的，如「中國工程師學會」，「造紙研究會」等是。但兩者有時亦不可判然分別，如「醫學研究會」等便兼具了兩者的性能。

清末民初以來，傳統家族制度的解體，代表了血緣組織的衰落；而會館制度的沒落，代表了地緣組織的衰微。學會於該一時期蓬勃發展，漸能表現超地緣的業緣功能。實際上清末許多商會、農會、自治會和其他非專業的學會組織，是從會館組織蛻變演化出來的；如閩學會、滬學會、四川學會等都擁有濃厚的同鄉組織的地緣性質。清末自強學會以下幾乎六百個學會中，有地緣的，也有業緣的，也有介於兩者間過渡的事緣性的。業緣的學會中多為職業或行業的，表現高度功能專化的學會極少；而且組合的意識型態往往殘存着血緣的濃厚色彩，如行業繼承和師生結合關係中，有時仍呈現著血緣的投影。民國以後，功能專化的學會陸續出現，是中國社會基礎結構從地緣化走向高度業緣化一個初步的現象。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又從地緣結合轉變到業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變遷，也是人類社會文化史上一個重大的變遷。奧門(G. Almond)的社會學概念，如果可以用來解析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的話，則此一時期的中國社會，顯然正從「非會社的」(non-associational)過渡到「會社的」(associational)<sup>④</sup>。在這一轉型的持續過程中，少年中國學會所代表的，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性的指標。

少年中國學會於民國七年六月間籌備，創始份子六人中有四人為四川人，其組合有濃厚的地緣性。且四人均有同學之誼，師生與同學關係在傳統倫理社會中，往往是血緣性的意識化。從這一角度窺測，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結合，還是殘存着血緣性和地緣性。但一年以後(民國八年七月一日)，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時，會員七十四人中來自十餘省區，籍貫觀念的消融，足以代表地緣性的減退，而相對的業緣性的傾向則逐漸增強。民國十年間在王光祈的倡議下，分科研究會的籌組計劃受到全體會員的熱烈支持，專業性的傾向特徵更顯露出來了。但是，由於中國傳統「非會社」基礎結構的強固，由於泛政治主義慣性力的支配，由於本身教育背景中專業訓練的薄弱，加上該一時期軍閥割據，列強交侵，政治環境與社會秩序又極端混亂，

<sup>④</sup> G. Almond: "A Funtional Approach" in G. Almond & J.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學會領袖羣想推展專業化運動，實缺乏有利的主觀與客觀條件。一旦受到外來思潮的猛烈沖擊，專業化的組合便呈現支離的現象，學會分化亦發端於此。而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期，新舊中西的文化因素紛然雜存，同時交互發生作用，學會領袖羣身處其間，最不易確立共同的認同(identity)。他們往往為動亂的時勢所驅迫，從非專業的道路上去尋求生存的意義與價值，抱持某種絕對的教條，參加狂熱的，盲目的羣衆運動；同時在組織上，手段上，把學會變成一種強制的機關，失去了自由結合的意義，漸趨於政黨的形式，感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導致了酷烈的黨爭局面。從清末的強學會<sup>④</sup>、南學會<sup>⑤</sup>到民國八年的少年中國學會，其演化過程在某一層面上如出一轍。如此不僅不能發揮正常學會的功能，推展社會的改革運動，却往往變成社會動亂的禍源；無形中使專業化的新知識階層無法建立，而且阻延了業緣性會社結構的發展。試觀少年中國學會中的國家主義派，其後結合而成青年黨，其中會員可查證者十四人，即有六人為四川籍，<sup>⑥</sup>幾佔半數，不能不說有地緣性的退化現象，與民國十年間該學會高度專業化的傾向成一強烈的對比，足可視為例證。

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少年中國學會的早期活動所代表的思潮，則無疑是一個復興中國固有文化，並且有條件吸收西方文化的運動。是一羣秀異知識青年在民族主義思潮沖擊下，從所遭遇的文化危機中集體覺醒，同應相求，羣策羣力來推展中國文化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他們吸收並擬聚了當時幾股重要的西方思潮，以雜誌書報為媒介，加以鼓吹，有力地介紹輸入中國，企求對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秩序作基本的改革。

中國近代譯介西方思想甚早，但正式而有系統的則由嚴復開端，他介紹英國達爾文(C. Darwin)一派的「進化論」，風靡一時。其後李石曾等介紹俄國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論」；王國維等介紹叔本華(Schopenhauer)、尼采

④ 參見張王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四章第一節「康有為的變法思想與強學會的創立」口「強學會的創立及其封禁」，頁一七四至一九〇。

⑤ 參見王爾敏：「南學會」，大陸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五、六期。張王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二一四至二一九。

⑥ 李璜(四川)、左舜生(湖南)、河魯之(四川)、余家菊(湖北)、陳啓天(湖北)、魏嗣鑿(四川)、江彭舉(四川)、劉正(四川)、楊永浚(四川)、楊效春(浙江)、曹芻(江蘇)、黃玄(安徽)、陳登恪(江西)、金海觀(浙江)。

(Nietzsche) 等德國的「意志說」，陳獨秀、李守常等介紹馬克思 (K. Marx)、恩格思 (F. Engels) 等德國的「唯物史觀」與「科學社會主義」；張君勱，張東蓀等介紹法國柏格森 (H. Bergson) 的「創化論」。胡適等介紹美國杜威 (J. Dewey) 的「實驗主義」，張申甫等介紹英國羅素 (B. Russell) 的「創造的衝動說」。至五四時期，新思潮的介紹，更成為學會活動的主流。從中國科學社編印的「科學」月刊，到少年中國學會所直接發行的「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當時西方湧現的各種主要的科技文藝的思潮，幾均有學會創辦的刊物從事介紹。他們不僅在雜誌上探討新理論，鼓吹新觀念，而且更邀聘當代西方的大師鴻儒，親履斯土來現身說法。在少年中國學會持續活動的時期內；自由主義的社會哲學家羅素來自英國 (1920)，實驗主義的教育哲學家杜威來自美國 (1919-1921)，生機主義的進化論哲學家杜里舒 (Hans Drieseh) 來自德國 (1922)。他們僕僕風塵於中國南北各地，到處演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學說，對文化思潮的取向，對青年知識的啓蒙，均有示範的影響力量。當時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南京各地讀書的會員，顯然都曾受到這些西方學人的相當陶鎔。明顯的例證之一是，承受杜威教育學說的精神，而以實驗教育為終身職志，且卓著貢獻者，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中頗不乏其人。<sup>④</sup>

據初步分類統計，「少年中國」月刊共發行四卷四十八期，包括會員通訊及籌備時期的會務報告等，合計文字六八二篇。其中討論「少年中國運動」者四五篇，「少年中國學會會務紀聞」七三篇，「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通訊」一四六篇，「附錄」廿五篇；討論「政治與經濟」者廿九篇，「社會問題」四四篇，「哲學思想」卅九篇，「宗教信仰」卅一篇，「文化與教育」二〇篇，「自然科學」廿二篇，「文學與藝術」卅三篇，「詩」一五六篇，其他十九篇。

「少年世界」月刊共發行一卷十二期，外加「日本號」一期，合計文字一五三篇，除發刊詞外，討論「學術思想動態」者十九篇，「學校調查」十七篇，報導「國內外學生動態」者一〇篇，「文教述評」十六篇，「婦女問題」十四篇，「蘇俄介紹」八篇，「國際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十一篇，「工廠企業調查與工人生活」八篇，「留法勤工儉學」四篇，「農村問題」八篇，「地方調查與遊記」十四

<sup>④</sup> 如吳俊升、常道直、古煤、曹芻、阮真、金海觀、楊效春、謝循初、邵爽秋、王克仁、唐愨等十餘人，多為南高出身的會員。他們在實驗教育的貢獻，是中國近代教育改革運動史上重要的一頁。

篇，「南洋介紹與華僑動態」九篇，「科學技術」五篇，其他九篇。

當時倡導新思潮的雜誌中，以北京大學教授羣主辦的「新青年」及該校學生羣傳斯年，羅家倫等人主辦的「新潮」最具號召力。他們刊登的文章，絕大部份是攻擊中國的傳統倫理與習俗制度的。他們的論據建立在科學，人權和民主的基礎上，可說一開始便以西方文化為重整反應的方向。「少年中國」月刊則不同，這可以學會原始創辦人王光祈的思想本質與趨向做具體說明。他不是西化派，因為他不願照抄西方國家的老路，認為不適合中國的民族特性；他主張以西方的科學方法，來規復並改造傳統文化。他起草的宣言書中，呼籲「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又標舉了四項信條：「奮鬥、實踐、堅忍、儉樸」，是他在傳統文化深刻的薰陶下，所凝聚的倫理精神。他後來更提倡整理國樂，來發揚傳統中的「禮」；這種以傳統文化為重整方向的整合的改造思想，在王光祈一生中是貫徹到底的。但民國八、九年間，曾慕韓和王光祈相繼赴歐，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在李守常一批社會主義派的主導下，開始走向偏激的道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為基底，來根本推翻並改造中國社會，也就是以西方文化做為重整反應的目標。所以少年中國學會所推展的本土運動，可以說是從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重整反應的方向，走向以西方文化為重整反應的目標的。從少年中國學會的言論資料中，可以偵測出上述西方思潮對那一代中國青年撞擊得最厲害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杜威的「實驗主義」與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就當時湧現的思潮分析，略可尋繹出六個脈絡：

(一)少年主義：少年主義自清末以來是一股新銳有力的思潮。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其以英文寫成的回憶錄中，屢稱早年的革命團體為「少年中國黨」(The Young China Party)。<sup>④</sup>梁啟超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有「少年中國說」一文說：「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國在。」他舉近代意大利的復興運動為例來印證「少年中國說」：「瑪志尼者

<sup>④</sup> 如以英文寫著有關倫敦蒙難的回憶文章“Kidnapped in London”，稱早期革命團體「輔仁文社」及「興中會」等為“the Young China Party.”。

，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異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他在文末附識一段話，感慨地說：「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sup>④</sup>他寫意大利三傑傳，寓意在此。黃遵憲曾贈詩梁啟超說：「我慚加富洱，子慕瑪志尼」。<sup>⑤</sup>光緒二十八年秦毓鎰等在日本發起「青年會」，是留學界中最早的一個革命團體。此會發起時，有人認為意大利獨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所以主張定名「少年中國會」，後來惟恐招致滿清政府疑忌，才定名「青年會」。光緒二十九年，楊度作「湖南少年歌」，倡言「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sup>⑥</sup>而民國以來以「少年」兩字命名的報刊雜誌當在二十六種以上。<sup>⑦</sup>從曾慕韓的日記推測，「少年中國學會」的命名似與梁啟超有直接關係，而間接得之於「少年意大利」的靈感。少年主義的思潮貫串並支配了整個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即在分化最激烈的時期，這一共同的新銳的色調亦無剝落的痕跡。在會約裡曾標明：凡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人，一律不得參加當時的污濁的政治社會，不請謁當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勢力，不寄望過去人物；大家研究新學問，學有所成，相期努力於社會事業，一步一步來創造少年中國。他們宣言：

<sup>④</sup>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二冊，卷五（臺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九年），頁七至十二。

<sup>⑤</sup>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十一，頁六（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年）。

<sup>⑥</sup> 「新民叢報」第四二、四三號合本，頁一九一至一九五，「飲冰室詩話」。

<sup>⑦</sup> 「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世界」（月刊）、「少年世界」（半月刊）、「少年世界」（半月刊）、「少年生活」、「少年先鋒」、「少年雜誌」、「少年社會」（半月刊）、「少年進德匯編」、「少年時代」、「少年時代」（半月刊）、「少年時代」（半月刊）、「少年時報」、「少年時事讀本周刊」、「少年法政」、「少年學園」、「少年畫報」、「少年戰線」（半月刊）、「少年科學雜誌」、「少年讀物」、「少年月刊」、「少年」（半月刊）、「少年周刊」、「少年周報」、「少年十日」、「少年之友」等。

「……自從歐戰的和約成立，我們不僅曉得中國的老年不可靠，同時證明世界的老年都不可靠。全世界的事業和一切待解決的問題，應由全世界的少年採『包辦主義』。我們既是世界少年團體的一個，所以把他標出來，以表明中國青年要與各國青年共同負改造世界的責任。」<sup>53</sup> 章太炎提出四種「少年中國」的精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要妄想憑藉已成的勢力；不要虛慕文明；不要好高騖遠，均為消極性忠告。胡適則從積極方面提出三個觀念：一為少年中國的邏輯，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要注重事實、假設（hypothesis）、證實。二為少年中國的人生觀：須有批評的精神；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須有社會協進的觀念。他以英國十九世紀宗教革新的「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來比喻少年中國運動。<sup>54</sup>

從學會早期的言論中所表達的「少年中國」，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充滿了浪漫的理想，所抱的宗旨也相當廣泛，彼此並未一致。直到民國十三年，王光祈在印行的「少年中國運動」一書的序言中，才為少年主義的思潮找到一個明確的歸宿。王光祈說：「『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

（二）民族主義：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肇端於民國七年留日學生罷學歸國的事件，故其早期結合的本質無疑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其後部份會員如李璜、余家菊等，提倡愛國教育，主張外國教會在中國辦教育，不能違背中國教育立國的宗旨；不能排斥異端，而妨害講學與思想的自由。並且最後歸結到，國內任何教會學校都必須向中國政府立案，由教育部嚴格加以監督。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依據此一主張，乃發起「國家教育學會」，<sup>55</sup> 以從事於反對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的運動。民國九、十年之交，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連續舉行了三次宗教問題講演大會：第一次請周作人、王星拱講演；第二次請梁漱溟講演；第三次請屠孝實、李石曾講演。他們另外又邀請羅素、莊斯敦、勃拉克和杜威。<sup>56</sup> 每次聽講者均不下五、六百人。王

<sup>53</sup>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少年世界發刊詞——為什麼要發行這本月刊？」（民國九年一月一日）

<sup>54</sup> 胡適：「中國之少年精神」；「胡適選集——演說」（臺北，民國五十五年六月），頁一五至二〇。

<sup>55</sup> 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三期（民國十年十月）「教育研究會簡約」草案之提出。

<sup>56</sup> 羅素後來改應北大哲學研究社之邀，杜威則表示不喜談宗教。

星拱、李石曾、羅素對宗教持反對態度；梁漱溟、屠孝實、周作人則持肯定態度。學會雖然聲明採取純粹研究態度，但反對的傾向溢於言表<sup>57</sup>。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八期，第二卷第十一期，第三卷第一期，充滿了這些理性化的反教運動的文字；<sup>58</sup>其中除田漢係泛神論者外，其餘都否定宗教。其後不少會員復加入「非基督教大同盟」。<sup>59</sup>可以代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蔡元培當時是會外贊助最力人士之一，他寫了「教育獨立議」一文，以響應「收回教育權」的運動，主張教育必須脫離「政黨」與「教會」二者而獨立。<sup>60</sup>民國四年，余日章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曾經把教會壟斷中國教育的情形，做了一個驚人的統計。他報告當時西人教會在華所辦學校，計有小學五千多所，中學師範二千多所，大學三十六所，傳道學校一百四十三所，工藝醫學校九十多所，學生總人數共達四十三萬八千九百二十七名。根據此一驚人統計，並追溯清中葉以來各項反教的史實，可知「收回教育權」運動，乃為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物。

(三)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是五四的中心思潮，少年中國學會在這方面的活動表現比較側重在全民教育的鼓吹與婦女地位的提倡。他們認為：「我們要創造『少年中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婦女問題。因為婦女占全國人數之半，若是婦女問題不解

<sup>57</sup> 見「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八期頁一，頁六四。

<sup>58</sup> 討論的文字有：第二卷第八期：「王星拱先生的講演」「梁漱溟先生的講演」、「屠孝實先生的講演」、「李煜瀛先生的講演」、「羅素先生的講演」，惲代英：「我的宗教觀」；田漢：「少年中國與宗教問題」。第二卷第十一期：劉伯明：「宗教哲學」；周作人：「宗教問題」；陸志韋：「宗教與科學」；方東美：「詹姆士底宗教哲學」；劉國鈞：「海甫定宗教經驗觀」；李達：「唯物史的宗教觀」；雁冰：「羅曼羅蘭的宗教觀」；太朴：「時代觀宗教」。第三卷第一期：周太玄：「宗教與人類之將來」；周太玄：「宗教與中國之將來」；李璜譯：「法蘭西學者的通信」；李璜譯：「該當要一個宗教的平民嗎？」；李璜：「社會主義與宗教」；李璜：「社會學與宗教」；李潤章：「宗教與科學」；周太玄：「宗教與進化原理」；李思純：「信仰與宗教」；李思純：「宗教問題雜評」；「蔡子民先生關於宗教問題之談話」（周太玄記）；汪頌魯：「我從未見過上帝」（小說）。

<sup>59</sup> 參看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頁三六七。民國十一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清華學校開會，提出「如何宣傳基督教於現代之學生」、「學校生活之基督化」、「學生在教會中之責任」，等問題公然向學校及學生宣傳基督教，於是南北兩京便有「非基督教大同盟」之組織，極力攻擊宗教並指責基督徒煽惑中國青年。

<sup>60</sup> 此文刊登於「少年中國」月刊三卷八期，為民國教育學術史上一篇重要文獻。

決，那就是半身不遂的『少年中國』。但是婦女問題不是男子所能解決的，是要婦女自身起來解決，不過是男子應負積極援助的義務罷了。<sup>⑩</sup> 所以他們向富有新思想的名媛徵稿，而編輯成第一卷第四期的「婦女號」，熱烈討論很多有關民主社會與婦女運動的問題。他們認為婦女解放是民主政治的前題；時代女性應該就讀大學，中國家庭應該改組，而新式模範家庭是社會進步的中心。「少年世界」響應此一婦女解放運動，連出兩期特刊「婦女號」，更具體討論到婦女的教育問題，並廣泛介紹歐美、俄國、日本、印度、朝鮮，以及南洋華僑婦女的概況，以為比較的具體資料。他們又於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四期編輯了「法蘭西號」，介紹這個民主先進國家的文明思想的面貌。他們又提倡勤工儉學和工讀互助，為全民教育運動開了不少新路。工讀互助團的概況已如前述，王光祈是發起人之一，當時他們籌措了一千餘元，捐贈書物，代租房舍，代向北大辦理免費交涉，使貧寒學生可以半工半讀，實行互助；此外所有一切事務，均由團員自決，即介紹團員，亦由該團自行開會審查。王光祈後來回憶說：「近代文化運動，有許多青年受其感化，亟謀脫離家庭。然社會黑暗實較家庭為甚，故不能不組織互助團，以圖自衛；一面反對腐敗之家庭，一面抵抗黑暗之社會，此亦為組織工讀互助團動機之一。」王光祈極反對「能力未充以前，須委曲求全於家庭」的說法，認為「委曲求全是消磨少年精神惟一利器，是養成民族萎靡一重要的原因。在能力未充以前，脫離家庭，正好磨練其治事能力，助長其嫉惡心理。若在能力既充以後，即或脫離家庭，已無多大意義。」<sup>⑪</sup>

從人格的文化背景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民主化運動的失敗有一重要癥結，即絕大多數從事民主運動者均缺少「民主人格」，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傳統的文化中生長的，每個人的「基本人格」(basic personality) 和「位分人格」(status personality)，基本上是由我們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家族制度決定的。任何會社結構都傾向於以家族制度為模型，去建造其他的制度。而個人，很容易以對待家長這種權威的態度去對待其他的權威。而中國的文化傳統，最注重家長的權威。在家長權威籠罩下所型塑出來的人格，在某些方面是缺乏獨立精神的。從這一角度分析，工

⑩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本月刊第四期特刊『婦女號』的啓事」。時該刊主編為王光祈，此一啓事顯係出自他的手筆。

⑪ 「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頁六四，「會員通訊」王光祈給渾代英的信。

讀互助團的活動，對民主主義思潮的推展，不僅止於助成平民教育的普化一端而已。

四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潮反映在少年中國學會較具體而有代表性者為「新村運動」。「少年中國」月刊從第一卷第三期起，登載了不少這種新村運動的文字，而王光祈、左舜生、宗白華、黃仲蘇等會員，均對新村運動有具體提議。他們理想的歸趣是：

「脫離了舊社會的範圍，另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從分工合作，造成我們的經濟獨立與文化獨立，而完全脫離舊社會的惡勢力圈。我們從實業與教育去發展我們團體的經濟與文化，造成一個完美的新社會，然後，通過這個新社會的模範，來改造舊社會。」<sup>69</sup>

少年中國學會部份會員的主張，顯然是受了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作品，及其在日向實驗新村生活的影響，已如上述。這個理想頗與西方十九世紀法人傅理葉（Ch. Fourier 1772-1837）的「華朗斯特爾」（Phalansteres）組織相似，在烏托邦社會主義中稱為「傅理葉主義」（Fourieisme）；也充滿傳統詩人「高臥南窗，自命義皇上人」的意境，彷彿亂世中退隱士大夫的「躬耕集團」。在十九、二十世紀，實踐此一意境，而在社會政治改革運動中造成絕大影響力的的典型人物則有俄哲托爾斯泰（Tolstoy）與印度聖雄甘地（Gandhi）。

胡適針對新村運動提供了深銳的批評，他指責這一「新村生活」的思潮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因為新村的人主張「完全發展自己的個性，所以是一種個人主義。他們要想跳出現社會去發展自己的個性，所以是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共同性質是：「不滿意於現社會，却又無可奈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胡適認為：「近代的新村生活，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他覺得新村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那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胡適當時引介了易卜生（Ibsen）的「健全的個人主義

<sup>69</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宗之槐：「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



」的人生觀做爲針砭，他鼓勵大家要做斯鐸曼醫生 (Dr. Stockmann) 和娜拉 (Nora) 一流人，要有「自由意志」，「能負責任」，「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敢於「特立獨行」。近代社會是一個漸趨動態的社會，於是個體的獨立與個人主義的流行，成爲心理思潮的重要趨勢之一。胡適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是積極而入世的，其實踐的趨向屬「抗議」(protest) 一型。而少年中國學會推展的新村運動，所代表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其精神是消極而出世的，實踐的趨向屬「退隱」(withdraw) 一型。此兩股個人主義，均爲該一時期有力的思潮。

(五)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思潮在民國以後，逐漸發展成一股支配性的力量，其後且成爲共產主義的濫觴。由於此一思潮的激盪，少年中國學會衍生了「社會主義研究會」，在李守常的主導下，終於與陳獨秀等人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合流，而演化成共產主義派。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後來加入共產黨而可查證者計有十四人，<sup>④</sup> 而學會思想分裂即導源於此。民國九年八月，在北京會員談話會上，李守常曾提出確定主義的問題，他認爲：「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爲聯合之行動。」<sup>⑤</sup> 至民國十年七月的南京大會，出席者二十三人中共產主義者六人，<sup>⑥</sup> 他們積極主張以社會主義爲學會工作的方向，欲使少年中國學會成爲政治性的團體，甚至企圖把學會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羣衆性團體。王光祈在學會活動的早期，也感染了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在「會務報告」第四期有一封信說：「……本來是研究外交的，因欲研究外交，故積極留意世界大勢，因留意世界大勢，不知不覺的就中了社會主義的魔術了。但是要研究社會主義，非研究經濟學不可，故近來極欲研究經濟，覺得現在世界上一切組織，多不合理，不滿意，皆非根本改造不可。」王光祈有限度地接受了社會主義，他分析了實現他的主張所必需依靠的社會力量，指出人類可分三種階級：知識階級、勞動階級、資產階級。他的理想社會是無階

<sup>④</sup> 李守常、毛澤東、鄧仲濤、張聞天、黃日葵、劉仁靜、張申府、楊賢江、惲代英、趙世炎、鄭伯奇、高君宇、沈澤民、侯紹裘。

<sup>⑤</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學會消息」。

<sup>⑥</sup> 鄧仲濤、高君宇、惲代英、黃日葵、沈澤民、楊賢江。

級的；知識階級同時便是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同時便是資產階級。但是現代社會上還是有階級的，應當從三種階級找出有覺悟的人，使三個階級互相接近，以實現理想社會。而在知識階級中青年是最有希望的，他們應當加入農村或工廠的勞動階級運動，傳授知識給勞動者。<sup>⑦</sup>他又發表「工讀互助團」一文，詳細敘述發起的動機及成立的經過，組織和預算，以及將來的遠景等。他說「工讀互助團是社會的胎兒，是實行我們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讀互助團果然成功，逐漸推廣，我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漸漸實現，那麼，這次工讀互助團的運動，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經濟革命』」。王光祈分析了工讀互助團的性質是一個：「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他認為這樣可以創造新社會而避免一場流血的革命。<sup>⑧</sup>這是王光祈社會主義的改革思想，也是他推展工讀互助運動的主要理論基礎。其後工讀互助運動變質，漸趨極端，終於招致失敗，王光祈對此亦有深切的檢討。他說：「北京工讀互助團對於脫離家庭之青年，予以相當後盾，雖為發起動機之一，然而亦未嘗積極的勸人脫離家庭。當第一組成立的時候，他們自己會議，應如何脫離家庭廢除姓氏，及團員所有私財應如何共產，種種澈底之主張。我當時勸他們不必如此，我們只要在團中，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不必倚賴家庭之供給罷了，又何必定要做出形式上之脫離家庭，廢除姓氏及團員所有私財均作共產等等花頭。他們那時很有笑我不澈底的樣子……。」<sup>⑨</sup>王光祈不贊成當時許多激進的主張，他所代表的，顯然是溫和型的社會主義思想。

（六）科學主義：中國近代科學化運動，可分由兩個層次來觀察：一為科學理論的研究與科學知識的傳播，另一則為科學主義思潮的泛濫。「科學」與「科學主義」實為不同的兩個範疇，前者為一門學問，後者為一種思想，但是「科學主義」則由「科學」而產生。「科學」的基本動念發自於懷疑；「科學主義」的基本動念則發自信仰。科學家可能同時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有其嚴肅的宗教生活；而科學主義者

<sup>⑦</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

<sup>⑧</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工讀互助團」。

<sup>⑨</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會員通訊」頁六四。

則十九是無神論者。<sup>⑩</sup>所謂「科學主義」是泛指知識界對科學的一種無保留的崇拜態度，迷信科學萬能說。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均可透過科學方法去認知和解決。這一思潮在西方自有其淵源，而在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大致可尋繹出兩大流派：

一為「物質的科學主義」（Materialistic scientism）。這一派在西方思想界從霍布斯(Hobbes)到哈克爾(Haeckel)，在社會學應用發展上則為孔德(Comte)和馬克思(Marx)。而達爾文的進化論(Evolutionalism)和牛頓(Newton)的機械論(Mechanism)提供了理論基礎，深化了這一思潮的科學解釋。於是科學的崇拜情緒與哲學思想相結合，這一派在十八、十九世紀遂造成了有力的物質世界觀。他們相信宇宙間一切生命均隸屬於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且均可透過科學方法予以控制與認知。在近代中國最能代表此一物質科學主義的思想家是吳稚暉和陳獨秀。吳稚暉是「哲學的物質主義者」(The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t)，而陳獨秀則是一個「辯證法的物質主義者」(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另一流派是「經驗的科學主義」(Empirical Scientism)。做為一種哲學及認識論，經驗主義以培根(F. Bacon)的哲學思想為其現代的開端。其歸納法由洛克(Locke)和休姆(Hume)應用到人文社會的領域而得到廣泛的新進展。達爾文三十年搜集的科學證據，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傳統，這種證據論的科學方法的精神力量，強化了實驗主義的思潮。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哲學的實證主義(Posilivism)逐漸轉變為實驗主義(Pragmatism)，杜威(J. Dewey)是這一派教育哲學的代表，而做為一個實驗主義者(The Pragmatist)，胡適是中國這一思潮最典型的代表者。<sup>⑪</sup>

此兩大流派均有其強烈的無神論和反宗教觀，他們不僅攻擊宗教而且批評傳統的世界觀；他們有意推翻古老的信仰制度和宗教權威，但無形中却建立「科學主義」的新信仰和新宗教。「科學主義」在近代中國，以科學力量的崇拜開其端緒，繼

<sup>⑩</sup> 王爾敏：「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四卷第五期，頁二八。

<sup>⑪</sup>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0-30。

而抨擊傳統，終於造成思想界的一種新宗教。這是中國科學化運動一個極富諷刺意味的不幸的發展。

科學主義在中國湧現之後，少年中國學會深受此一思潮之衝擊，他們的宗旨標示「科學的精神」(Scientific Spirit)，其後拒絕任何宗教組織成員入會，更是承受此一思潮支配的具體表徵。他們主張從外國教會手中收回教育權，為民族主義運動，亦為科學主義運動。宗白華在通訊中討論到學會研究學理的旨趣，有一段痛切的話說：「……現在一班著名的新雜誌（除去北京大學月刊同科學雜誌），都是滿載文學的文字同批評的文字，真正發闡學理的文字極少，只能夠轟動一班淺學少年的興趣，作酒餘茶後的消遣品，於青年的學識見解上毫不增益，還趾高氣揚的自命提倡新思潮。……世界的新思潮在學術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學的精神。……試看他們的文字有幾篇真有科學的精神？（發闡科學的更少）有幾篇用科學方法澈底研究社會問題？……借着一點名學的方法批評一班糊塗可憐，於歐西學問茫未問津的舊人物，對於一班最新鮮可愛的青年並沒有貢獻。所以我們月刊要根本變動，發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學理的價值，……總要有點科學的精神，纔於青年讀者有點知識上的增益。我們要打破中國人的文學腦筋，改造個科學腦筋，這是我們月刊的目的，不過我們要真正實行，不可再是口頭禪的『科學』、『科學』，還不曉得『科學』究竟是什麼東西；對於幾個最重要的科學像生物學、心理學、算學、名學等，還沒有澈底研究過。」<sup>179</sup>

魏嗣鑾也指出當時科學主義泛濫的現象而加以批評說：「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競言科學，而實不知科學。其所以競言科學者，習聞人言，知非科學不足以起廢，故特操熟語，以為名高也。其所以不知科學者，科學艱深，非一蹴可幾，玄談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難就易也。頃年以來；思想革新，誠甚盛矣。然試登高遠矚，國內書報，刊行者何限，亦嘗有專言精確科學者乎？亦嘗有腳踏實地，本其鑽研之所得，而後發為言論者乎？（大要皆道聽塗說或抄襲剽竊）美洲之「科學」，北京之「大學月刊」、「理數雜誌」，其言論文章，稍近科學矣，然其銷行之廣；能

<sup>179</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會員通訊」頁五十七。

如其他鼓吹謬論者乎？」<sup>⑳</sup>

但這種少數會員的自覺未能力挽狂瀾，<sup>㉑</sup>少年中國學會深為科學主義的思潮所淹沒；由於專業訓練背景的薄弱，他們乃茫然於分辨「批判的態度」(critical attitude) 與「方法論的權威」(methodological authority)，「科學的客觀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 和「絕對的理性」(absolute rationality)，「科學法則」(scientific law) 與「武斷的教條」(irrefutable dogmas) 之間的區別。<sup>㉒</sup>這無疑是科學化一重阻力，也是中國近代化運動所以延緩的原因之一。

## 五、領袖群的抽樣人物——王光祈的改革思想與過渡性格

王光祈是「五四人」，五四時代是一個浪漫的啓蒙時代。五四精神最強烈的一面是對中國的過去全部而澈底的否定。在那段所謂「五四時代」中，反傳統的吼聲響澈了雲霄，新思潮的狂飈掀動着滔天巨浪；年輕的一代追求解放，要求再生。他們不顧一切，超越了藩籬，衝決了網羅，他們強勁而具有浪漫色彩的衝動，搖撼了兩千多年來因襲的文化傳統的根基。這種具有浪漫色彩的衝動，在當時確曾為中國帶來一番破壞性的新氣象，但同時也為其後社會文化的發展帶來許多嚴重的問題。在那個浪漫的，狂熱的時代裡，王光祈最能表現其獨立不倚的性格，最能信持淺淡

<sup>⑳</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會員通訊」頁五十八至五十九。

<sup>㉑</sup> 茲舉一例說明：民國八年（1919），亦即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一年，國際科學界發生了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根據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新學說「相對論」（the theory of relativity）所推測的日蝕現象，在那一年完全證實。此次日蝕，由觀察及攝影所得的結果，證明行星位置與太陽的關係，顯然有變動。這與愛因斯坦計算的結論完全符合。至此「相對論」的提出，從假設到印證，實在性已告確立，而成為科學界一個偉大的新理論和新定律。前此認為思想家的一大玄想，至此乃博得全世界科學家的公認，而且共同相信是新時代科學思想成功的一種至高無上的收穫。少年中國學會以提倡科學的使命感，故注意此項新理論的發展。但他們為此編印了一期「相對論號」（「少年中國」月刊三卷七期），却僅有三篇浮泛的報導性文字：魏嗣鑿「相對論」；「讀國內相對論著述以後的批評」；王克祈「我所知道的安斯坦」。外加沈意譯介的一篇「恩司坦的新世界觀」（「少年中國」月刊二卷七期），少年中國學會研討相對論者，前後僅此四篇而已。

<sup>㉒</sup>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00.

的理智主義，因此也最能靜下心來思索破壞後的建設問題，思索知識份子於舊文化、舊社會、舊禮教被衝動推翻以後的新處境與新生命。他對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和系統的構想。

由王光祈早期為少年中國學會所草擬的一些文獻中，可以歸納出他的基本思想如下：他嚮慕先民敦厚的風格，反對政治鬭爭；他提倡社會事業，企望通過發展科學和文化教育，振興實業來改造中國。他認為：「現在中國一切腐敗，皆待吾人改革，其所以獨對於社會事業特別注意者，因同人等認為一切不良，皆原因於社會不良，故注意改革社會。所謂社會事業者，不過教育與實業而已。教育者所以革新一般思想，灌輸各種知識；實業者所以改良吾人生活，增進物質上的幸福。」<sup>⑯</sup>他雖然主張社會改革，但並不讚成俄國革命，認為「該國列寧等所奉的馬格斯之國家社會主義，採集產制度，國家權力甚大，究竟與個人自由，有無妨碍，實是一個疑問。我極反對機械的個人生活，受這種勞農政府支配的國民，處處都有一種國家權力緊緊跟隨，個人生活便成一種機械了。」<sup>⑰</sup>

在「少年中國」月刊最初的幾期裡，王光祈寫過幾篇嚴肅的文章闡述他的「少年中國主義」。在「少年中國之創造」<sup>⑱</sup>一文中，他標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要使中國成為未來的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使中國人民的風格制度和學術生活等等，都能適合於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他一度主張國際主義，其寓意在此。在「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sup>⑲</sup>一文中，他特別強調團體生活和勞動習慣的重要性，「譬如中國人最缺乏團體的訓練，我們學會便提倡組織種種團體。又如中國知識階級大多數不習勞動生活，勞動階級又無機會得受教育，故我們提倡半工半讀，使讀書者必作工，作工者亦得讀書，務使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打成一片。……」少年中國所從事的是預備工夫，想先將中國人個個都造成一個完全的「人」。王光祈和左舜生

<sup>⑯</sup> 「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民國八年三月一日），會務紀聞。

<sup>⑰</sup> 「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四期（民國八年六月一日），「王光祈致幼樁、太玄」（五月二十二日）。

<sup>⑱</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sup>⑲</sup>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首先倡議「小組織」，而且推行工讀互助運動，是「團體生活與勞動習慣」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試驗。民國九年一月間，他決定赴歐留學；在「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的通訊中，他聲明此行的目的有三：

- (一)聯絡世界各地華僑之優秀青年；因為「少年中國」的運動係先從學生、華工、華僑三類人下手。
- (二)籌辦華盛頓通信社；將中國一切有價值的運動，及中華民族青年的精神，要表現出來，譯成外國文字，在美國發表，為一種青年的國際運動。同時要把世界大勢，西洋社會狀況輸入國內，以備參考。
- (三)個人求學問題；欲求得一種較有統系的學問，研究經濟學，因為人類進化與經濟組織有密切關係。◎

主張社會活動的王光祈，至此漸有走向專業化的傾向。

旅歐第二年，他以通訊方式寫了一篇雜感，提到一本名叫「桃花」（Pfirsichbluten）的詩集，並譯介德國一家報紙“Vossische Zeitung”稱頌「詩經」的話：「中國民族是富於精神修養的民族，無論在什麼淒涼困苦的境遇，他們都是處之泰然……。希臘哲學家說，天空中有一種自然和諧的音樂（即地球周行天空鼓動空氣的聲音），這種自然和諧的音樂，只有中國人聽見，一一譜入他們的詩詞。……」故國之思與志趣的轉變，已溢於言表。他認為歐洲自大戰後，一般學者頗厭棄西方物質文明，傾慕東方精神文明。他舉史賓格勒（Spengler）的「西方之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等書出版後風行一世，◎以及西人大談孔子之道，並盛誇老子學說的事實，認為「要抬高現在中國民族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創造新文化，以貢獻於世界。否則至少亦應將中國古代學術介紹一點到歐洲來，一則使東西兩文明有携手機會，可以產生出第三文明，二則亦可以減少歐洲人輕視中國民族的心理。……」◎一個民族復興與文化整合的藍圖已映現在這篇雜感之中了。

◎ 「少年中國」月刊第一卷第八期（民國九年二月），頁六三至六四。

◎ 王光祈譯史賓格勒（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一書為「歐洲之末運」。

◎ 「少年中國」月刊第二卷第八期；王光祈「旅歐雜感」，頁六一至六三。

當少年中國學會的思想分化漸趨激烈，王光祈苦思冥索，提出許多折衷的方案，盡了調和的努力；及其無效，復撰兩篇嚴肅有力的文章，廣泛而有系統地表達他的改革思想。他認為中國近三十年來之改革運動，在歷史上可稱道者有三：一為「戊戌變政」，二為「辛亥革命」，三為「新文化運動」。「戊戌」，「辛亥」兩次之改革運動，其形式雖有所不同，而其精神則皆為政治改革。換言之，即如何將政權奪到手中，然後利用政治權力，以實行其大規模的改革。凡相信政治改革的，有兩種根本觀念：(一)欲改革社會非取途於政治不可；由這一觀念所演出者為政治運動。(二)官僚萬能；由這一觀念所演出者為賢人政治。所以當時革命派和立憲派所攻擊者為滿清政府，所爭取的是政治權力，所醉心的是日本維新，所從事的是軍事政治。王光祈對這種「政治改革」表示懷疑，提出五大難題：(一)主張政治改革者以政權為改革中國之手段，試問以何方法得此政權？(二)即使獲得政權，試問用何勢力以擁護其政權？(三)即便政權能擁護，以中國幅員之大，民俗之蔽，有何方法而厲行其改革之政策？(四)即使政策能厲行，試問此種由上而下之改革，是否適於時代精神？換言之，所謂「賢人政治」，在二十世紀新潮流中，有無存在之價值？(五)即使適於時代精神，試問於此列強虎視眈眈之中國，是否容吾人有此強有力之政府？他相信改革者必須以畢生精力投之於社會事業；與其作教育總長，不如作小學教師；與其作農商總長，不如作種樹園丁。「因為若思想不革新，物質不發達，社會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虛想」。他對新文化運動的青年照舊再走政黨的迷路，感到悲觀失望，因為他們這樣做遂斷絕了社會改革的一線生機。<sup>63</sup>

以上是王光祈在「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一文中的見解。三個月以後，他又寫成「社會的政治改革與社會的社會改革」一文，更深化了他的改革思想，而且提出了社會專業化的理論。他說：

「今之從事政治活動者，大抵皆主張『政治的政治改革』，換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政治。政治一旦改革，則其志願畢矣。其較為思深慮遠者，則主張『政治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社會。社會一旦改革，則

<sup>63</sup> 王光祈「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八期，頁三至五。



其目的達矣。前者眼光短小，不足有為；後者方法錯誤，不足有成，皆為吾輩所不取。吾輩所承認者，則為『社會的政治改革』，換言之，即以社會勢力促進政治。吾輩所從事者；則為『社會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即以社會自力促進社會……。」<sup>④</sup>

他進一步分析，就政黨的基礎論，則須從事「社會的政治改革」，如蔡子民之於北京大學，張季直之於南通事業，其社會勢力固由於一手造成，將來領袖智識階級之蔡子民與領袖工商階級之張季直，必為政治上之兩大中心。為政客生活論也須從事「社會的政治改革」，因為世界愈趨進化，則政治活動成為國民的普通義務；政客必須先尋一種職業；如此對於政治活動，雖偶爾失敗，尚有職業老巢可以退居，報效社會，猶有其道。否則專以政治為生涯，而視官廳議院為其噉飯之所，一遭失敗，便陷於「吃飯危險」，勢非再將飯碗奪回不可。

王光祈這種社會專業化的論點是精闢而一針見血的。近代中國官僚階層缺乏專業化的生活背景（Professional career），構成了政治結構流動的阻塞，而妨礙了全民政治的發展，且往往導致奪權政爭的局面。王光祈指陳的「政客專業」的現象，是中國傳統泛政治主義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王光祈討論到「社會的社會改革」，認為無論就社會需要或社會分工，這是改革運動最可遵循的唯一途徑。他痛切指陳：「吾國民族今日之所以陷於如此悲運，其原因雖多，而其最重要者，則無過於社會腐敗，內政外交不過其表面者耳。外交之危殆由於內政之腐敗；內政之腐敗由於社會之麻木。有縱容安福部之社會，然後始有媚日賣國之安福政府；有縱容張作霖、曹錕之社會，然後始有國際共管之說。……」「除少數『政治的社會改革者』之外，必同時賴多數『社會的社會改革』為之輔助，始能收效。……」這是王光祈的社會改革的分工主義。他舉黃任之、胡適、梁任公、汪精衛四人為「社會的政治改革」的代表；舉創造日本帝國基礎

<sup>④</sup> 王光祈：「『社會的政治改革』與『社會的社會改革』」，「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八期，頁四八至四九。

的福澤諭吉<sup>⑤</sup>、嘉納治五郎以及樹立俄國勞農根基的托爾斯泰與俄國大學生為「社會的社會改革」的典型，來說明他的改革進化論。他又曾投稿德報，論「留學生與中國政治」，以留學生的思潮為史例，分析三十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的進化，而歸納成三大派別：(一)留日學生大抵主張「政治的政治改革」，他們最大成功為辛亥共和革命，而最大失敗則為未植社會基礎。(二)留美學生大抵主張「社會的政治改革」，他們最大成功，為國內產業勃興，其最大失敗，則為違背時代潮流。(三)留歐學生大抵主張「社會的社會改革」，如留法之李石曾，留英之吳稚暉，留德之蔡子民等人。他們將來的最大成功則必為文化勃興，平民崛起。他進而評論說：「留美學生知欲改革政治，必先於社會上植其基礎，故歸國後努力從事教育、實業，不遺餘力，以為他日獻身政治之後盾。此與十年前留日學生之只知投身軍旅，羣趨政界，毫無社會基礎，而謀政治改革者固大異其趣矣。」<sup>⑥</sup>

王光祈到後來進一步把「少年中國運動」歸結為「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他於民國十三年在德國寫著了「少年中國運動」一書，闡發了個人許多對民族文化的精湛的見解。他一方面強調改革政治必先健全社會，而健全社會又必先培植國民的修養，故敦請有志改革之士從事「社會的社會改革」。另一方面他積極主張以西洋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發揚國粹，來復興民族文化。

王光祈認為應該把一切罪過都歸之於社會與人民的身上，因為「政治之不良係由於無良好社會，良好社會之所以不能養成，又由於無良好人民之故」，所以應該先造「人」。中國的衰弱也是因為人民的性格「充滿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貪吝、無聊種種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壓迫，軍閥才敢專橫」。中國人「不宜

---

⑤ 福澤諭吉(1834-1901)，為日本維新時代一位傑出而有廣大影響力的學者教育家。他創辦慶應大學，開私人興學的先河。且致力介紹西方文明思想，特別是英國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他的人生哲學強調獨立、自尊、與社會福利。曾遊學美國(1860)和歐洲(1867)，著有「西洋事情」、「學問のすすめ」、「文明論の概略」等書，並創刊「時事新報」，對新思想的輸入與普及的工作貢獻極大。帝國議會於其生前擬授予爵位，以酬殊勳，他以平民淡泊自居而拒絕接受。

⑥ 王光祈：「『社會的政治改革』與『社會的社會改革』」，「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八期，頁四八至四九。

多罵人，只宜責自己」，應當努力於改造個人和整個民族，從事一種「自反自修的國民改造運動」。王光祈這種改革觀念是極具卓見，且符合現代社會心理學原理的。在基本上，現代學者認為一個社會的「現代化」工作是「心理的」(Psychological)問題，也即是「人」本身的問題，因為「人格」(Personality)的轉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工作。<sup>⑧</sup>王光祈的見解可以代表中國近代改革思想演進的新里程；由器物的(technical)，制度的(institutional)，到思想行為的(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他已注意到這涉及整個「行為模式」(behavioral patterns)的變遷。他的「無須去奪得政權」的主張是「社會的社會改革」思想的必然結論之一；同時也顯示出他已相當了解新文化的發生、傳衍以及與舊文化之間的整合關係。所以他暗示「少年中國運動」應走向「社會的社會改革」，並明白指出「少年中國運動」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而其「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王光祈說：

「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真是簡陋枯寂得很！持與歐人豐富愉快的生活比較，未免相形見絀。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二種：一為無識，二為無業。因為無識的人太多之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不知什麼叫做『人生』。因為無業的人太多之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國民生產，日趨退化。要醫治這兩種病症，只有普及教育與發展實業兩法。」<sup>⑨</sup>

實業方面，他主張於工業、商業、農業三者之中，應側重農業。王光祈注意到中國以農立國，數千年來重農傳統早已深入人心，所以農業現代化是基本而重要的。至於教育方面，他主張於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以外，應注意「感情教育」。從這一觀念，他衍生了「音樂救國論」。他認為改造民族生活的指導精神是要利用西洋的科學方法整理中國民族固有的文化思想。王光祈說：

「我嘗因此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詳考細察西洋人的習俗，最後乃恍然大悟，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由這種『禮樂』

<sup>⑧</sup> D.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E. E.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D. C. Mc 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三書於此均有廣泛而深刻的討論。

<sup>⑨</sup> 左舜生：「王光祈先生事略」；「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十一至十二。

以養成中華民族的根思想。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為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為處世待人之道。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為涵養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為協和萬方之用。我們中國人生息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為其基礎。所以中華民族的根思想，與我們古代禮樂有至深密切之關係。我們的古禮古樂，誠然有許多不適用於今的地方，而且簡陋得很；但是古人立禮製樂的本意，則千古不磨。我們現在宜利用西洋科學方法，把他整理培植出來，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思想，完成我們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sup>⑧</sup>

王光祈並不僅僅空談，在闡述改革思想的同時，他以整個生命力來從事實踐的工作。旅德十六年間，他埋頭著述；在參考資料貧乏的異邦，他「讀中國舊籍，往往糾紛錯亂情形，數月不能得一解」，<sup>⑨</sup>而「計算音值，往往至於深夜」。<sup>⑩</sup>這樣「孤苦奮鬥的結果」，他前後譯著了十七種以上有關樂理與樂史的書籍；一方面介紹西洋音樂於中國，如「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西洋製譜學提要」、「西洋樂器提要」、「西洋音樂史綱要」、「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等書，介紹西洋音樂進化的歷史，敘述西洋十二音樂名家的生平和他們的作品，描寫近代西洋歌劇史與樂器史；這是一個空前有系統的介紹工作。又從事於比較研究，如「翻譯琴譜之研究」、「對譜音樂」、「東西樂制之研究」、「各國國歌評述」、「音樂」等。另一方面則努力於國樂史的整理，並將中國的古樂介紹於西方，如以德文寫作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之歌劇」(Die Chinesische Klassische Oper)，是介紹中國的崑曲於歐洲的；此外尚有「中國音樂史」、「東方民族之音樂」等書。其中「中國音樂史」一書被公認為是最具透視力的獨步一時的創作。他用科學的方法，站在進化的觀點，從聲律的起源，以至宮調的轉變，樂器的進化，樂譜的改進，樂隊的組織，歌劇舞劇的結構，都尋源探本，詳加引釋，把中國音樂源流，闡述無遺。他有新史家的精神，又有精密的鑑別古籍的眼光，所

<sup>⑧</sup> 同上，頁十至十一。

<sup>⑨</sup> 王光祈：「中國音樂史」自序。

<sup>⑩</sup> 王光祈：「東西樂制之研究」自序。

以對一切資料，都能運用批判的態度，是兼具樂理與歷史價值的著作。他自述寫著此書的目的是要「創造偉大的國樂」，使中國能「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是要保存「先民文化遺產」，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他相信；中國將來的國樂「須建築於『民族性』之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同時「自然科學，只能於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於吾國生產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爲之團結。」中國民族精神的復興必須以民族感情的音樂爲其先導。王光祈說：「吾將登崑崙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從新沸騰。」<sup>②</sup> 這是何等深摯的「感情教育」與「音樂救國」的理論。

在民國文化史上，王光祈不是一個聲名揚溢的人物。他雖然在「五四」的洪潮中打過滾，也濺出了浪花，畢竟未曾分享「五四」的光華，便遽然從歷史視野裏退隱了。直到民國廿五年一月十二日，他患腦溢血症猝然客死萊茵河畔的波昂城寓所，並未在短暫的四十五年生命中，實現其「社會的社會改革」的思想，可以說「齋志以歿」。但他磊落而悲愴的行跡，似曾爲歷史留下一些困惑，寫照出不少值得深思的問題。其中迫切需要發掘和探討的問題之一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過渡性格及其「花菓飄零」式的宿命。<sup>③</sup>

近代中國所處的是一個大轉型時期，是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一個持續過程。在新思潮猛烈沖擊下，傳統文化逐漸暴露了弱點，敏感的知識份子開始對舊的一切由懷疑而疏離，進而挑戰而背叛。他們置身於間不容緩的民族感受威脅的社會心理的激情之中，沒有沉思和廻想的餘地，於是浪漫的衝力湧現了。他們所標示的企願，無論是良心的覺醒，停滯社會的推進，或羣體生活方式的徹底改革，都往往只基於一種「改變的野心」(ambition for change)。梁啓超在強學會時代提出「變的哲學」，認爲「窮則變，變則通」。但另一方面，由於鄉土的單重認同，由於人格文化背景的支配，由於對偉大歷史的緬懷，對西方文化君臨的屈辱，他們無法拋脫傳統所遺留的「種族中心的困局」(ethnocentric predicament)。這種文化思緒的

② 同上。

③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的花菓飄零」；「祖國周刊」第三十五卷第一期。此文討論該一問題，平實而具透視力。

交錯與矛盾，構成了「過渡人」(the transitionals)的交集壓力，使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扮演着衝突的角色(contradictory role)<sup>⑧</sup>這一「過渡人」的心理特質，表現在學會領袖羣的言論、思想、行爲，尤爲明顯。比較奇突的現象之一是，他們言行往往不一致，且前後自相矛盾而有雙重人格的傾向。譚嗣同是強學會與南學會的領袖之一，他著有「仁學」一書，主張衝決網羅，毀棄傳統的倫常，認爲「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爲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但戊戌政變一役，他終於無所顧惜，爲「君臣」一義而慷慨犧牲。嚴復於光緒廿一年(1895)發表「關韓」一文，公開指責「君主」爲「民賊」，他對韓愈的「原道」一篇推崇古聖人給予人民的恩賜，看作君臣合作領導人民的必要觀點，發出強烈的批評，充滿了自由與激進的思想；但廿年後竟擁護袁世凱爲帝。<sup>⑨</sup>陳獨秀提倡民主，鼓吹科學，不遺餘力。他力圖打倒「孔教」，結果建立了「科學主義」的新宗教；他高唱「民主」不容置疑的論調，却自陷於教條主義與權威主義而不自知。

做爲一個近代學會領袖羣的抽樣人物，王光祈一生的思想行爲，具備了「過渡人」的特性。他早期研習法律，兼及政治經濟，走的是一條通人的道路；其後倡組「少年中國學會」，領導「工讀互助團」，大小事件多由他一人悉心擊劃，「發揚蹈厲，神彩飛越」，朋友推崇他是創辦少年意大利的馬志尼，他也以一個社會運動者自居。但旅德後却判若兩人，「鑽研中西古樂學理甚勤，形容憔悴，性趣孤僻」，<sup>⑩</sup>在留學界中幾成隱士。蟄伏萊因河畔波昂城，集中精力於中西樂理與樂史的綜合研究，可謂盡瘁於一個音樂理論的工作崗位上，以專家終其身。而同時又無法改變傳統文士(literary intellectual)的通人性格，企求在專業性的音樂理論之外，對廣泛的外交問題與國防政策繼續發揮其言論的影響力。他努力翻譯了「李鴻章遊俄紀事」、「庫倫條約之始末」、「西藏外交文件」、「三國干涉還遼秘聞」

<sup>⑧</sup> D.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ree Press, 1966. pp. 43-75

<sup>⑨</sup> 參見 B.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Narper Torch books, New York, 1969. 徐高阮：「嚴復型的權威主義及同時代人對此型思想之批評」，故宮文獻第一卷第三期(民國五十九年六月，臺北)頁一至十七。

<sup>⑩</sup> 李璣：「我所認識的光祈」；「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三五。

、「瓦德西拳亂筆記」、「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美國與滿洲問題」等書，都是近代史上極富參考價值的外交史料，足見他對中國政治動態的關切。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底，王光祈痛感強鄰壓境，國難當頭，曾寫一信給時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的舒新城，提出一個編譯國防叢書的大計劃，其內容包括軍事、經濟、外交、教育等。其後譯成而經書局印行者，雖僅「空防要覽」、「國防與潛艇」、「經濟戰爭與戰爭經濟」、「德、英、法戰時稅政」四種，亦可想見其用力之精勤。細釋他的改革思想，此時又有另一週折，他說：

「吾輩從前主張從事社會事業，以築國家基礎；經此連年內戰國力凋敝之後，益覺從前主張，確有見地。政治活動，見效雖似甚速；但社會根基不固，終有拔苗助長之虞。」<sup>⑧7</sup>

這是他「社會的社會改革」思想的再強調，但他接着又說：

「不過僅僅從事社會事業，尚嫌不足。必須將『社會』設法加以組織；使國家軍權財權等等，一一移到『社會』手中。然後中國始能安寧，始能發達。」<sup>⑧8</sup>

他進一步說明他要借國防問題，將此理想實現，因此草擬「團練國防軍」一文，「其內容係在徵兵募兵制度之外，另立一法。將軍權逐漸移入社會手中；對於內憂外患復能同時兼顧。」<sup>⑧9</sup>民國廿四年四月二十日，最高當局聞王光祈續學苦行，曾電柏林使館，轉詢：「如願回國，當圖借重」。他電覆使館說：「如有相當位置，自願回國，報效祖邦，如能先以位置相示，以便自揣，能否勝任，再行決定行止，尤為感謝。」他要求當局先以「相當的位置相示」，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社會的社會改革」者應有的態度了。<sup>⑨0</sup>

從這些晚期痛切的議論，著作表現，以及對國家危難的態度，可清晰反映出一個過渡人的改革思想如何從「社會的社會改革」回歸到「政治的社會改革」，如何

<sup>⑧7</sup>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見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四九至五〇。

<sup>⑧8</sup> 同上，頁五〇。

<sup>⑧9</sup> 同上。

<sup>⑨0</sup> 魏嗣鑿：「我所能記憶之光祈生平」；「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三九。

徬徨於「政治」與「社會」之間，又如何通人沒落與專家升起的過程中，呈現他的困窘與矛盾。他企求「社會的社會改革」，却不能忘情政治；他敦勸新生的一代要做一個園丁，一個小學教師，却爲自己要求「相當位置」；他一直想把自己訓練成一個專家，却無法擺脫傳統文化背景中通人性格的慣性力的支配。這種過渡人的心理特質，在他旅居德國以後，又滲雜了「邊際人」(marginal man)的性格而顯得更強化了。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羣集於西方文化冲刷過的沿海各大城市中，甚至留學異邦接受西方文化長期直接的薰陶，由於對嶄新的文化環境力圖適應又無法完全適應，無所依托的緊張心理衍生了「成就的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並導引出「進步的觀念」(concept of progress)，使他們內心充滿了動力，奮發向前，勇邁過人。王光祈認爲數十年來西洋留學生之無負於國家者，唯有嚴復和辜鴻銘二人。他曾發一宏願，決心以個人生命力兼事嚴、辜二人未竟的志業。他日夜埋頭於波昂圖書館中竟以身殉的工作精神，顯然是承受了過渡性與邊際性所交織而成的心理壓力的驅迫。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上海局勢粗定，舒新城想念王光祈的事業才幹與廣博學問，認爲他應回祖國爲國家社會服務，所以去一長函，痛論國內各方面的情形，且再三提及從事社會事業的舊信念，促他早歸，入中華書局任事；王光祈以「擬編譯之國防叢書，非在德國再住一二年，不能竣事」爲理由，婉辭了朋友的邀請。<sup>⑩</sup>民國廿三年六月間，王光祈考得波昂大學音樂博士學位；沈怡因出席國際道路會議再度遊德，曾勸他早日回國；他却寫信叮囑，不必爲他的事情奔走，因爲他覺得自己在德國，隨時有著作與國人相見，並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可比。<sup>⑪</sup>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王光祈又覆魏嗣鑾一信說：「兄等來示，弟皆敬悉，弟非不思歸，但苦國內無相當位置，故暫處國外，以著譯事業，報效祖國而已。……」<sup>⑫</sup>以一個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居然對祖國鄉土的熱切招喚如此故作淡漠，王光祈黯然心境的背後實隱現着另一層更廣大而嚴重的歷史意義。

<sup>⑩</sup>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見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四九。

<sup>⑪</sup> 沈怡：「追懷光祈兄」；「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五三。

<sup>⑫</sup> 魏嗣鑾：「我所能記憶之光祈生平」；「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三九。



從一個更遼闊的歷史視野看來，近代學會活動，本質上是知識份子的羣衆運動；少年中國學會及其活動所代表的，只是近代整個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羣衆運動的一個小環節，而王光祈只是這小環節中單一的個體而已。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通稱「士大夫」，一向擁有高超的流品及穩固的位望。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爲他們建立了一座溝通政治與社會的橋樑，使士大夫構成了士紳階級，而其終極目標是做官；所謂「學而優則仕」成爲社會心理上一層根深的基本理念與強固的傳統。但廿世紀的中國，這情勢便大爲改觀了。光緒卅一年（1905），科舉制度正式廢除，造成嚴重的歷史性的「斷橋現象」；影響所及，遂在政治上導致了文人政治的沒落，在社會文化上造成了知識份子的疏離與飄零。這一「斷橋現象」的直接結果之一是敲響了士紳階級的喪鐘；從此大量的士大夫乃從傳統上層架構中解離了出來。新式教育不僅未能提供權力追求的基礎，且連起碼的生活保障也付諸闕如。從政的坦途斷絕了，而政局動蕩不寧，又使專業化的知識階層一時難以建立，於是廿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遂失去了皈依，陷入空前的困境。他們在挫折與飄零之中演化成無數個別的小悲劇，而其背後實反映著一個時代的大徵象——中國知識份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與政治社會的疏離，成爲被遺棄的、孤獨的、無根的一羣「無行者」。這種因缺乏專業能力所造成的疏離感 (sense of alienation) 最容易驅迫人走向極端。在近代中國史上，以這種疏離感爲媒介所促成的知識份子的結合，經常以學會的組織型態出之，而表現了狂熱的政治性格與強烈的干政慾望，遂成爲政黨的先驅與革命的動力，且往往爲社會文化動亂的根源。少年中國學會的悲劇性的歷史圖象所提供的，只是其中一個較顯著的史例而已。

作者年來致力於近代中國學會活動及其領袖羣的歷史性的探索，漸能警覺到此一問題的嚴重。直迄目前，雖然尚乏全面及精確的統計論據，做爲描述的與分析的基礎，但從資料的初步觀察中已經可以推測，此一問題的存在及其惡化，無疑是，而且更將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重大的阻力。

## 六、結 論

以少年中國學會爲一立足點，綜合觀察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則下列幾點

論證，實堪注意：

(一)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涵容於四種不同的基本權力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這四種權力是皇權、紳權、幫權與民權。在現代民主化的過程中，功能學派的社會學家所推測的理想發展是：「皇權變質而成向人民負責的中央政權，紳權變質而成民選的立法代表，官僚變質而成爲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務員，幫權變質而成工商業的公會和職業團體，而把整個政治機構安定在底層的同意權力的基礎上。」<sup>⑩</sup>從少年中國學會這一史例探測這種權力結構關係的轉型，其展望殊難樂觀。因爲從傳統幫權蛻變到職業性的公會或專業性的學會，社會結構的高度業緣化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和前題。如果沒有高度業緣的觀念做爲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和主軸，則這一幫權的勢力容易歸附紳權，而表現其積極參政的傾向或強烈干政的慾望，進而演化成革命性的政黨。民初政黨，因「官僚政客用作投身政治之工具，其總數不下三百餘個。」或係掌故家誇大說詞，但對照清末強學會以下，大量工商公會及職業團體，均轉化成政黨雛型，而許多以學會姿態出而號召者，其性質功能且與政黨混淆不可鑑別，是幫權歸化紳權，甚至依附皇權的跡象，仍極明顯。少年中國學會功能專業化的努力的失敗，其背景尙有待於深入的分析，但影響所及顯然加速了會員的思想分化，促成了黨爭的局面，無疑是現代民主化運動一個不幸的發展。

(二)近代學會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推展，自有相當積極的功能。從少年中國學會這一史例看來，重要的一點是開啓大衆化的知識，造成普遍參與的現象。特別是「五四」以後，白話文逐漸流行，知識大衆化增加一個最有力的傳播媒介。他們創刊雜誌，舉辦演講會，均以白話形式出之。由於知識與媒介的相互刺激發展，使該一時期的社會大衆，投入更廣大的溝通網（Communication nets）中，如此促進整個社會與文化的交融，使新思潮的湧現更能深入底層，普及民間。以個人主義的思潮而論，少年中國學會直接參與的工讀互助與新村運動，是這一思潮的具體反應。當時年輕一代，響應此一運動，接受此一思潮感染，因而毅然離鄉背井，甚至脫離家庭，去追求個體的獨立生活者，爲數不少。「普遍參與」（Popular particip-

<sup>⑩</sup>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鄉土重建」，頁一五八至一六三。

ation) 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涵，因為這樣才能動搖牢固的地域觀念，培養廣大人民的「國家認同感」(national identity)，促進大羣意識的產生，造成統一國家的型態。而「個體的獨立」則為現代化的心理基礎，因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個人與環境的關係急劇變化，無法再依附家族權威。個人的變動成了社會流動——垂直的或平面的——基本單位；上述兩者均為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層面。<sup>⑩</sup>

(三)從政治多元論 (Political pluralism) 的角度觀察，少年中國學會的分化過程也足以提供政黨政治發展的縮影。此一學會的會員，從民國十三年以後，因為國內政治社會的急劇變化，分化成若干派別；國民黨、青年黨、共產黨、新中國黨；另有一部分則在學術及教育界專心研究，超然於黨派之外。<sup>⑪</sup>但從思想的基本型態看來，僅有三種勢力：社會主義派是「激進的」(radical)，國家主義派是「保守的」(conservative)，超然於黨派之外的王光祈與國民黨中的周佛海等人則屬「自由的」(liberal) 中間勢力。當一個社會面臨新舊思想勢力尖銳對立，將急劇變化的時候，全賴有一中間勢力折衝緩和其間，把保守勢力的進步成分加以吸引，將激進的溫和份子加以安撫，使兩者均不致各走極端，而成為保守與激進間的中流砥柱，則民主政治的發展才有穩固的基礎。少年中國學會在思想分裂過程中，中間勢力的自由派似未發揮左提右挈的協調功能，遂使激進保守各趨極端。這也可以具體而微的反映出清末以來政黨政治發展失敗的某些癥結。英國是近代政黨政治的先驅，而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於此所發揮的積極功能，為民主制度的健全發展提示了範例，足供比較與借鏡。<sup>⑫</sup>

<sup>⑩</sup>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p. 9-26.

<sup>⑪</sup> 如王光祈、魏時珍、周太玄、宗白華、楊鍾健等。

<sup>⑫</sup> 西方近代學會運動，以費邊社為一典型個例。該社於1883年在倫敦 (London) 成立，早期創辦人包括歷史學者畢沙 (Edward R. Pease) 等人，其原始目標是：以「最高德性重建社會」(recontructing socie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ghest moral possibilities.)。文學家蕭伯納 (G. B. Shaw) 及西廸尼韋伯 (Sidney Wedd) 等均先後加入，其後該社領袖羣中陸續網羅了在學界有重大貢獻的學者甚多，可謂人材薈粹。1889年，該社開始編印「費邊漫筆」(Fabian Essays)，鼓吹溫和的社會主義。雖然，社員如蕭伯納等曾深受馬克思主義 (marxism) 薰染，但他們的經濟

四多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停滯不前的許多原因中，知識份子成爲政權的一部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從士紳階層的本質及其功能，可以得到證明<sup>⑧</sup>。清末以來少數先覺的知識份子已瞭解自己面臨了一個歷史的新階段，認識到權利地位的深刻變遷，知道他們不能再像傳統的文士，扮演「通人」的「無行」的角色；而必須走進知識的特定領域中去提煉專業能力，然後建構一個嶄新的知識階層，發揮專家輿論的主導力量，對政治階層產生制衡作用。王光祈的「社會的社會改革」的思想，說明了人才觀念與傳統知識份子封鎖身份的改變，可以代表該一時期重要而澈底的自覺。但是過渡人的心理特徵，往往使他們在新舊中西的矛盾中徬徨；使他們無法擺脫泛政治主義慣性力的支配，使他們寧願捨棄專業領域中的「巨人」地位，而自屈於官僚階層下的「侏儒」。加上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遭逢劇烈的鉅變，傳統政治結構解體，帝國主義交侵，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生活匱乏，客觀環境不會提供充分有利的條件，俾使該一時期的知識份子走向專業化的道路；這不僅阻礙了社會的改革運動，而且延緩了社會結構高度業緣化的發展。

(五)「五四運動」被早期的學者稱爲廿世紀「東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殊非恰切的歷史比喻。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涵交熾着浪漫的激越與理性的啓蒙，在情感上對中國傳統的某些點面產生深切的厭惡；在理知上又不能從中國傳統一元論的有機思想模式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於是激烈的反傳統思想遂導向於「全盤西化」的企求，而以「西化」(Westernization)取代「近代化」(Modernization)。在這一時代

---

觀要淵源於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功利主義思想主張「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企求以和平改試的方式來促進社會福利，而反對暴力的階級鬥爭。此一學會對英國近代政治改革運動及政黨政治的發展，影響甚鉅，表現了多方面的積極功能，這從自由黨(Liberal Party)和工黨(Labour Party)以及社會立法的歷史中符接。詳見A. M. McBriar, *Fabian Socialism & English Politics 1884-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6, pp. 234-345。又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會林立，其中如明六社(1873)，立志社(1874)等，不僅爲改革運動的先鋒，且爲政黨政治奠定始基，倘持與中國近代學會運動的過程做一大規模的客觀比較，當具歷史意義。

⑧ Chung-li Cah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55, xiii-xxi, pp. 1-70.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62, pp. 92-125.

精神的籠罩下，少年中國學會對西方思潮的湧現也反映出一種「饑不擇食的好奇」（omnivorous curiosity），幾乎對所有新學說新觀念均無保留加以接受。王光祈等人的改革思想所代表的，在當時是傑出的，少數的例外。這種把自己連根拔起，向西方一面倒的現象，從五四以來的歷史觀察，不但不易使自由思想在中國泥土上生長，反而使自己成爲一個文化的失落者。文化繼承變遷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新的必須從舊的蛻變出來，沒有鄉土基礎的文化移植是不可能生根的。「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由分化而寂滅，構成一個悲劇性的史例，象徵着五四時代趨近結束。中國新文化復興運動，必須是以傳統文化爲基底的一個整合與重建的運動。而王光祈的思想輪廓，於此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藍圖。

（六）在民族主義思潮猛烈的沖擊下，近代學會活動呈現了羣衆運動的特性。羣衆運動是喚醒和革新一個停滯社會的動力。雖然羣衆運動並不是在任何環境中，都能揭開一個歷史的新紀元，但在世界近代史域中的許多事實——最典型的是明治新維——都證明只有藉着羣衆運動所喚起的熱情，社會的改革才會成功。<sup>⑨</sup> 民國八年，王光祈在其「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一文的結論中有這樣的呼聲：

「青年青年！我們應該恢復過去的民族精神，創造未來的少年世界！」

「中國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創造者！是中國舊社會的改革者！」<sup>⑩</sup>

民國十四年，他明確答覆調查表「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一欄有一段話：

「我相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係以要求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爲宗旨（漢、滿、蒙、回、藏傳統稱爲中華民族）。其方法係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入手，以培養民族實力。」<sup>⑪</sup>

民族主義並未成爲歷史的陳跡，就國際現勢觀測，廿世紀的下半葉依舊是民族主義

<sup>⑨</sup> 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 Perennial Library, 1966, p. 149.

<sup>⑩</sup> 王光祈：「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少年中國」月刊一卷六期（民國八年十二月）。

<sup>⑪</sup>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見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紀念冊」，頁四六。

思潮高漲的時代，而其涵湧激盪之勢正方興未艾。<sup>⑩</sup>王光祈心目中的民族主義的羣衆運動是結合了「鄉土的認同」(native identity)，和「專業的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把專業知識的追求和愛國情操的發揚打成一片。這種鄉土化的真情與專業化的理性融會的境界的映現，無疑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一個新的轉機，也是近代化改革運動一個重要的曙光！

六十、五、十二

---

⑩ Tom Mboya, "The Mass Movement"; Joseph Stalin, "Nationalism Outside Europe"; Sultan Galiev, "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East", Elie Kedourie, ed.,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and Cleveland, 1970, pp. 477-487, pp. 552-561, pp. 562-561, pp. 562-570